

南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的演變

李玉珉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兩晉、南北朝，維摩詰信仰盛行，然而南、北文化不同，在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上，兩地有別。因維摩詰辯才無礙，是兩晉、南朝清談名士崇拜的偶像，所以居士型維摩詰的單身像在南方較為流行。現存北方的維摩詰經圖像，則多以維摩詰、文殊對坐像的表現形式為主，與南方傳統大異其趣。北朝早期的維摩詰或作菩薩裝，或著胡服，北魏遷都洛陽以後，積極推行漢化政策，在南朝文化影響下，身著漢服，秀骨清相，前憑隱几，或後靠隱囊，姿勢自在不羈的維摩詰像始在北方大量出現。北朝維摩詰經圖像可分為維摩詰經像和維摩詰經變兩大類，其中以表現簡單的維摩詰和文殊隔龕或隔佛對坐的維摩詰經像數量最多，分布地區也最廣。此外，在河南、山西和甘肅東部發現敘事色彩較豐的維摩詰經變，但各地的表現差異甚大。

關鍵詞：南北朝、維摩詰、文殊、維摩詰經變、南北交流

一、引言

維摩詰梵名 Vimalakīrti，音譯為維摩詰、毗摩羅詰，意譯為淨名、無垢稱，是一位智慧無量、辯才無礙、遊戲神通的法身大士，以在家居士的形象示現，為《維摩詰經》的靈魂人物。

《維摩詰經》是印度早期一部重要的大乘佛教經典，約成於西元第一、二世紀。¹ 此經結集不久，便被翻譯為漢文。依據歷代經錄記載，此經在中國先後共譯七次：

- (一) 東漢中平五年（188），嚴佛調（約二世紀）在洛陽譯《古維摩詰經》二卷，已佚。
- (二) 三國吳黃武年間（222-229），支謙（約二世紀－三世紀）在建業（今江蘇南京）譯《佛說維摩詰經》二卷，今存。
- (三) 西晉元康元年（291，一說為元康六年(296)），竺叔蘭（約三世紀）譯《異維摩詰經》三卷，已佚。
- (四) 西晉太安二年（303），竺法護（約 229-306）譯《維摩詰所說法門經》一卷，已佚。
- (五) 東晉（317-420）祇多蜜譯《維摩詰經》四卷，已佚。
- (六) 後秦弘始八年（406），鳩摩羅什（344-413）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大寺譯《維摩詰所說經》三卷，今存。
- (七) 唐永徽七年（650），玄奘（602-664）在長安大慈恩寺譯《說無垢稱經》六卷，今存。²

此外，竺法護還刪除此經中的逸偈，作《刪維摩詰經》一卷。西晉惠帝時（259-307；290-307 在位）支敏度有鑒於支謙、竺法蘭和竺法護譯本的辭句頗有出入，文意混雜，遂以支謙翻譯的《佛說維摩詰經》為主，以其他二本附入，成《合維摩詰經》五卷。³ 這些經典中，除了玄奘本外，皆完成於西元 500 年以前，《維摩詰

1 Larua Gardner Heyrman, "The Meeting of Vimalakirti and Manjusi: Chinese Innovation in Buddhist Iconograph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14;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頁35。

2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36-38。

3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38。

經》在中國早期佛教受到重視的程度於此可見一斑。四至六世紀時研習、講述、持誦《維摩詰經》的人眾多，南北朝（420-589）還出現許多《維摩詰經》的義記、注疏，充分反映南北朝時《維摩詰經》流傳的興盛，而兩晉、南北朝時維摩詰經圖像的出現和流行，無疑是當時維摩詰信仰風行下的產物。

儘管《維摩詰經》來自印度，但目前在印度與中亞均未發現與《維摩詰經》有關的作品，維摩詰經圖像顯然是中國本土藝術家的智慧結晶。1930年代，日本學者秋山光夫⁴和松本榮一⁵即展開中國維摩詰經圖像的研究。1950年代末，臺灣學者莊申⁶和中國學者金維諾⁷亦進行了中國維摩詰變相的探討。1968年美國學者Emma C. Bunker也加入了此研究的行列，發表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īrti一文，⁸是第一篇專門討論東晉、南北朝維摩詰圖像的論著。歷經八十餘年中外學者的努力，中國維摩詰經圖像的研究已成果斐然。

由於敦煌莫高窟保留了大量的維摩詰經變，過去大部分的研究多偏重於敦煌維摩詰經變的探討，⁹近十餘年來，一些學者開始梳理中國早期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脈絡。肖建軍在〈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¹⁰中指出，五世紀末至六世紀末中國維摩詰經變的發展是一個內容不斷豐富、表現形式逐步精細、由象徵符號圖像漸趨圖像敘事的過程。于向東於〈6世紀前期北方地區維摩詰經變的演

4 秋山光夫，〈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卷10號（1936.10），頁595-611。

5 松本榮一，〈燉煌画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頁143-164。

6 莊申，〈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大陸雜誌》，17卷8期（1958.10），頁246-248；莊申，〈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下〉，《大陸雜誌》，17卷9期（1958.11），頁284-288。

7 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1959年4期，頁3-8；金維諾，〈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1959年4期，頁54-60；此二文後收入金維諾，《中國美術史論集》（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4），中卷，頁193-201和202-211，唯〈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一文的篇名改作〈壁畫《維摩變》的發展〉。

8 Emma C. Bunker, "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īrti,"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1 (1968): 28-52.

9 除了上述松本榮一、金維諾的論著外，重要的著作如下：藤枝晃，〈維摩變の系譜〉，《東方學報（京都）》，36冊（1964.10），頁287-303；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1983年試刊2號，頁62-87；後收入賀世哲，〈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頁225-282；賀世哲，〈維摩詰經變〉，收入賀世哲，〈敦煌石窟全集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181-197；鄒清泉，〈虎頭金粟影——維摩詰變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潘亮文，〈敦煌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試析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佛光學報》，新1卷2期（2015.7），頁535-584。

10 肖建軍，〈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9期，頁131-145。

變——兼論與南朝佛教圖像的關聯》¹¹中談到，六世紀前期北方維摩詰經變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不但維摩詰形象漢化，還出現了隱几、隱囊等器用，這樣的變化應受到南朝文化的影響。盧少珊的〈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¹²，將北朝（386-581）和隋代（581-619）維摩詰經圖像歸納為佛說維摩詰經表現、維摩文殊主體性表現、裝飾性表現和特殊表現四大類。依據這些表現形式的分析，她認為大同地區和河洛地區的圖像有直接傳承關係，關中地區則獨立發展，隴東地區自北魏晚期以來受大同及河洛地區雙重影響。潘亮文的〈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¹³，根據其所收集 53 件與維摩詰經圖像有關的南、北朝單尊造像和碑像的分析，她指出這些作品分布在河北、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甘肅、四川和安徽，其中河南地區的作品數量最多且延續時間最長，山東地區的發展最晚，河北早期的作品可能受到山西大同地區的影響，而北魏遷都洛陽以後，山西造像的庶民性格日益明顯，並認為六世紀至北朝結束時，與《維摩詰經》相關造像以河南為中心向外發展。

上述這些研究成果涉及層面甚廣，或從時代發展脈絡剖析，或從區域角度切入，提出不少卓見。不過南北朝時，南、北兩地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脈絡有何不同？二者的互動狀況如何？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雖然是一個由簡而繁的發展過程，但是在此發展過程中，各個地區是否同步？六世紀時河南地區與《維摩詰經》有關作品的數量眾多，但此現象是否就足以說明河南為當時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中心？此外，北朝維摩詰經圖像多元，即使同樣的情節，不同地區的表現手法也時有差異。由此看來，在中國早期維摩詰經圖像研究上，仍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發展的歷史面貌尚不夠清晰。此外，學者們對有些作品的內容詮釋不一，亦有再檢討的必要。因此筆者擬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行一些補充，試圖更清楚地說明南北朝時，南、北兩地維摩詰經圖像的嬗遞歷程，並探討彼此互動的關係。

11 于向東，〈6世紀前期北方地區維摩詰經變的演變——兼論與南朝佛教圖像的關聯〉，《藝術設計研究》，2016年4期，頁11-17。

12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1期，頁64-96。

13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佛光學報》，新4卷2期（2018.7），頁137-202。

二、兩晉、南朝的維摩詰信仰與圖像

晉朝（266-420）已有僧人誦持《維摩詰經》作為修行功德，如蜀石室山釋法緒、山陰顯義寺竺法純，¹⁴不過中國最早大力宣揚《維摩詰經》的是東晉名僧支遁（314-366）。支遁本姓關，字道林，世稱支道人，或支道林，為般若學六大家之一，精通佛理又善玄談，雖為僧侶，但和當時的士族名流王洽（323-358）、殷浩（?-356）、許詢、郗超（336-378）、孫綽（314-371）、謝安（320-385）、王羲之（303-361）、王濛（309-347）等都有往來。孫綽〈道賢論〉言：「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支遁所注的〈莊子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服。¹⁵根據《世說新語》的記載，支遁是當時名士圈內的一位皎皎者。¹⁶

支遁不但講說《維摩詰經》，又屢屢稱揚維摩詰。他在〈五月長齋詩〉中言：「淵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疊疊維摩虛，德意暢游方。」¹⁷於〈維摩詰讚〉云：「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疊疊讚死生。」¹⁸在〈入不二入菩薩讚法作菩薩讚〉又說：「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鹿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¹⁹從上述諸文中讚美維摩詰的「玄音」、「玄韻」、「玄心」等字句可以看出，在支遁時代，《維摩詰經》的思想與魏晉玄學的論旨若合符契。²⁰

東晉時，與支遁往來的名士中，不乏擅長《維摩詰經》者。《高僧傳》記載：

（支遁）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眾人

14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頁125。

15 （梁）慧皎，《高僧傳》，收入高楠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冊50，卷4，〈釋支遁傳〉，頁348中-349下。

16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100。

17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冊中，卷20，〈晉詩〉，頁1078。

18 （唐）道宣，《廣弘明集》，收入《大正藏》，冊52，卷15，〈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維摩詰讚〉，頁197上。

19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15，〈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不二入菩薩讚法作菩薩讚〉，頁197中。

20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51。

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²¹

按當時的講經制度，主講者為法師，輔助問難的人稱都講。根據上文支遁與許詢多次往返問答的狀況來看，許詢對《維摩詰經》的瞭解亦應十分深入。此外，殷浩「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²²顯然亦研習《維摩詰經》。謝靈運（385-433）還作〈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²³孫綽所作的〈遊天台山賦〉，化用了《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喜見菩薩之言。郗超在〈奉法要〉中又曾四次引用《維摩詰經》經文，²⁴以上種種在在說明，東晉的清談名士對《維摩詰經》十分熟稔。《維摩詰經》中大量的名理辯難與名士玄談的表現一致，其所宣揚的教義亦與玄學之義相契合，經中辯才無礙的維摩詰更成為當時清談名士的典範。

上承東晉傳統，迨至劉宋（420-479）初年，士大夫仍尊玄談。南朝僧人研習、講述、持誦、註疏《維摩詰經》蔚為風氣，如劉宋的曇諦、僧導、智斌、曇瑤、道慈、法宗、普明、慧慶、法莊、曇詵、僧鏡、慧鏡；蕭齊（479-502）的曇度、法安、寶亮；蕭梁（502-557）的智藏、慧約、僧宗、僧慧、寶瓊、淨暉、僧辯、妙智、明徹、僧達、曇斐、慧基、慧超²⁵、令惠²⁶、智秀²⁷、道琳²⁸；陳（557-589）的警韶²⁹等。在皇室、貴族與士大夫層階中，熱衷鑽研《維摩詰經》者也不在少數，如宋武帝（363-422；420-422 在位）曾敕壽春石澗寺釋僧導「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畢集。」³⁰蕭齊建元元年（478）高帝（427-482；479-482 在位）「幸莊嚴寺，聽僧達法師講《維摩經》。」京師太昌寺僧宗「善

21（梁）慧皎，《高僧傳》，卷4，〈支遁傳〉，頁348下。

22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文學篇〉，頁234。

23（唐）道宣，《廣弘明集》，卷15，〈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維摩詰經中十譬讚〉，頁200上-200下。

24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53-57。

25 參見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69、頁124-126、頁128-147。

26（梁）寶唱，《比丘尼傳》，收入《大正藏》，冊50，卷4，〈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傳〉，頁947中。

27（梁）慧皎，《高僧傳》，卷8，〈釋智秀傳〉，頁380下。

28（梁）慧皎，《高僧傳》，卷12，〈釋道琳傳〉，頁409上。

29（唐）道宣，《續高僧傳》，收入《大正藏》，冊50，卷7，〈陳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頁480上。

30（梁）慧皎，《高僧傳》，卷7，〈釋僧導傳〉，頁371中。

《大涅槃》、《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齊世祖（即齊武帝，440-493；482-493 在位）不許外出。」³¹ 永明二年（484）齊武帝「敕請妙智講《勝鬘》、《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眾雅服。」竟陵王蕭子良（460-494）不但於永明八年（490）請淨暉於府第講《維摩經》，且自己也好諷頌、講述此經，著《維摩義略》五卷、《受維摩注名》一卷，並自書《大字維摩經》一部十四卷、《細字維摩經》一部六卷，無疑為一位竭力提倡《維摩詰經》的名流。此外，蕭齊時研習《維摩詰經》的士人尚有王融（467-493）、沈約（441-513）、褚淵（435-482）、蕭穎胄（462-501）、張緒（422-489）、周顒（?-485）、王簡棲等。梁武帝（464-549；502-549 在位）嘗請慧超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並臨聽覽，他還作《淨名義記》。梁武帝家室的許多成員也崇信維摩詰，如高祖丁貴嬪（484-526）、高祖阮脩容（477-543）、梁武帝長子蕭統（501-534）、簡文帝（503-551；549-551 在位）、元帝（508-555；552-555 在位）。除梁武帝王室家族外，蕭梁士人崇信維摩詰者也不在少數，如陸倕（470-526）、王筠（482-550）、劉孝儀（484-550）、蕭子雲（487-549）、蕭子顯（489-537）、王僧孺（465-522）等人，謝舉（?-548）還作《淨名經注》。³²

以上資料顯示，自東晉至南朝，維摩詰信仰不但深受僧人的重視，在皇室、貴族、士人、名流的上層社會中亦極為風行，歷久不衰。

根據畫史記載，最早繪製維摩詰像的應是與荀勗（?-289）齊名的畫家張墨。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成書於 639）稱，隋朝官本中有張墨畫〈維摩詰變相圖〉一卷，下註：「梁太清目所無」。³³ 唐張彥遠（815-907）《歷代名畫記》（成書於 847）的著錄則言，張墨畫〈維摩詰像〉。³⁴ 由於西晉為維摩詰信仰的萌發時期，尚不具有製作情節豐富的〈維摩詰變相圖〉的歷史條件，而《貞觀公私畫史》又稱張墨的〈維摩詰變相圖〉為梁代太清目所無，故推測此〈維摩詰變相

31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 120。

32 參見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頁 120-121；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 127-162。

33（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冊 1，頁 173。

34（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入中國書畫研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卷 5，冊 1，頁 69。

圖〉卷可能為後人偽託之作。因此，綜合裴孝源和張彥遠的記載，筆者推測張墨所畫的應是〈維摩詰像〉。《歷代名畫記》記載：「張墨、陸探微、張僧繇，並畫維摩詰居士，終不及顧（愷之）創者也。」³⁵ 由此看來，張墨的〈維摩詰像〉應是一幅作居士狀的維摩詰單身像。

上文所言支遁所作的〈維摩詰讚〉和〈不二入菩薩讚法作菩薩讚〉，皆收錄於《廣弘明集》卷十五〈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³⁶ 中，顯然這兩首讚是支遁看到維摩詰像後撰寫而成。可惜這兩首讚均未描述他所見維摩詰像的圖像內容，其具體的形貌目前已不可知。

在眾多的維摩詰經圖像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乃東晉顧愷之（約 345-406）在瓦棺寺（又作瓦官寺）所作的〈維摩詰像〉，《歷代名畫記》卷五言：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故人稱之三絕：畫絕、才絕、癡絕。……長康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訖，光彩耀目數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363-365）瓦棺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眾以為大言。後寺眾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³⁷

由於顧愷之在瓦棺寺作畫時，支遁尚在世，且二人的社交圈重疊，支遁的〈維摩詰讚〉或許就是他看到瓦棺寺顧愷之所畫〈維摩詰像〉後所寫，也未可知。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在蕭梁時便與晉義熙（405-419）初師子國所獻玉像、戴逵（約 331-396）手製佛像五軀合稱「瓦棺寺三絕」。³⁸ 會昌五年（845），唐武宗（814-846；840-846 在位）毀佛之際，宰相李德裕（787-850）鎮浙西，將此畫移入其創

35（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 2，頁 29。

36（唐）道宣，《廣弘明集》，卷 15，〈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維摩詰讚〉，頁 197 上-197 中。

37（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 5，頁 71-73。

38（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54，〈諸夷傳〉，頁 800；（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 5，頁 73。

立的甘露寺大殿外西壁，故得倖免於難。大中七年（853），經盧簡辭轉入內府，³⁹後不知所終。

顧愷之的〈維摩詰像〉作於興寧年間，當時鳩摩羅什尚未翻譯《維摩詰經》，可見其所根據的文本可能是流行於江南地區的支謙本。由於此畫作現已不存，我們僅能從有限的材料中，揣度這件名作的一些圖像特徵。《歷代名畫記》稱顧愷之「畫維摩詰一軀」，顯然顧愷之所畫的維摩詰應和張墨之作一樣，是一尊維摩詰的單身像。《歷代名畫記》又言：

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與張皆效之，終不及矣。張墨、陸探微、張僧繇，並畫維摩詰居士，終不及顧創者也。⁴⁰

黃元之（活動於八世紀上半）〈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則云：

由是觀其道場妙矣，謂應供而來儀，牀枕儼然，疑有懷於問疾。目若將視，眉如忽頰，口無言而似言，鬢不動而疑動。豈丹青之所歎詠，詠相好之有靈哉！⁴¹

依據這些資料所提供的線索，顧愷之所畫的維摩詰乃作一病體孱弱、秀骨清像的居士樣貌，其雙眉緊皺，面有鬢鬚，閉口不言，沉默不語。⁴²這種人物造型正好與東晉的審美觀相符，可見顧愷之將維摩詰塑造成清談名士的樣貌。根據張彥遠「隱几忘言之狀」的記載，顧愷之所畫維摩詰應前倚憑几，可是黃元之的碑記卻又有「床枕儼然」之語，意指畫中有床，床上有枕，此枕可能就是俗稱「隱囊」的倚枕。據揚之水考證，隱囊源於天竺，隨佛教傳入中國，為南北朝時期身高貴人物身邊的坐具輔助物。⁴³只是憑几和隱囊皆為供人憑伏的器用，一為前倚，一為後靠，為何畫中會出現兩件功能相近，但使用方法有別的器用？究竟兩人所見的顧

39（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3，頁57。

40（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2，頁29。

41（清）董誥等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卷266，冊6，頁3414上-3414下。

42 有些學者認為，「隱几忘言之狀」正是〈入不二法門品〉中維摩詰以「默然無言」的方式來闡明「真入不二法門」的表現。（賀世哲，〈維摩詰經變〉，頁284；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127窟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頁170。）不過，比對經文發現，維摩詰「默然不語」的情節始見於鳩摩羅什的譯本，卻不見於支謙的譯本。而顧愷之作畫時，鳩摩羅什本尚未譯出，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可能典據南方流行的支謙本，是故上述學者的詮釋值得商榷。

43 揚之水，〈丹枕與綰紉〉，收入揚之水，《曾有西風半點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132-134。

愷之〈維摩詰像〉是同一件作品嗎？目前資料不足，無法揣度。

劉宋時，維摩詰仍以單身像的形式出現。《高僧傳》載釋僧慶「到大明三年（459）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⁴⁴從僧慶在「淨名像前焚身供養」一事來看，這尊維摩詰像應為一單身像。《歷代名畫記》載，陸探微（?-485）畫〈維摩詰像〉、〈維摩詰阿難像〉。⁴⁵依據〈維摩詰阿難像〉的畫名來推測，此畫可能在描繪《維摩詰經》〈弟子品〉中，世尊身有小疾，阿難持鉢求乳，而遭維摩詰斥責的故事。若此推測無誤，陸探微已經以敘事畫的手法來描寫《維摩詰經》的情節。陸探微的高足袁倩則更進一步繪〈維摩詰變〉一卷，《歷代名畫記》卷六稱此畫「百有餘事，運思高妙，六法備呈，置位無差，若神靈感會精光，指顧得瞻仰威容，前使顧、陸知慚，後得張、閻駭歎。」⁴⁶「百有餘事」一語明確指出，此畫卷的情節繁多，其處理方式必與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列女圖〉等相同，故事內容在長卷上逐步展開，是維摩詰經圖像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蕭梁畫師張僧繇（活動於六世紀上半葉）也曾作〈維摩詰并二菩薩〉、〈維摩詰像〉，⁴⁷根據題名來看，張僧繇仍是以維摩詰居士為表現重點。

依據畫史記載，自晉迄南朝，江南地區維摩詰經圖像已出現單身像和敘事性畫卷兩種表現方式，但以前者較為流行，張墨、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都曾作〈維摩詰像〉，這應和在魏晉玄學的影響下，崇尚清談的名士視博學善辯的維摩詰為楷模息息相關。

上述畫史所載與維摩詰有關的作品，無一倖存。在稀少的南朝的佛教遺存裡，僅在成都市西安路出土的一件三佛並坐蕭梁背屏式造像的背面，發現維摩詰經圖像（圖1）。畫面右側帷帳中維摩詰左手持麈尾，右手扶三足曲弓的隱几，坐於床榻之上；面無髭鬚，頭頂戴冠，身著雙領下垂寬袖大衣，作居士狀。左側寶帳中文殊菩薩頭後有圓光，坐於疊澀束腰座上，左手舉至肩前，右手垂於體側。二者皆作八面，呈對談狀。盧少珊和潘亮文認為維摩詰床榻前的女子為天女，文

44（梁）慧皎，《高僧傳》，卷12，〈釋僧慶傳〉，頁405下。

45（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6，頁81。

46（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6，頁85。

47（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7，頁94-95。

殊帳前所立的比丘爲舍利弗，且二者之間安置蓮花寶珠。⁴⁸不過由於維摩詰床榻前的女子和文殊寶帳右側所立比丘的尺寸懸殊，與一般天女和舍利弗大小相近的表現有別，所以筆者認爲維摩詰床榻前的女子當爲侍女，而文殊寶帳兩側所立比丘尺寸相近，當代表文殊菩薩的脇侍。此外，二者之間蓮臺上的物件不似寶珠，較似香爐，故認爲盧少珊所主張其「象徵清淨莊嚴之佛國淨土」之說亦不成立。文殊菩薩的帳後有一尊佛立於蓮座上，左右各有一脇侍弟子，盧少珊認爲，此景可能表示釋迦佛在毗耶離城講述《維摩詰經》。⁴⁹值得注意的是，此作所見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對坐的圖像，在南方並不流行，但這種配置方式於五世紀下半葉至六世紀時，在北方卻十分普遍（詳見下論）。

四川地近關隴，歷史文化背景複雜。五胡十六國時期，西北流民入川建立成漢政權（306-347），東晉破成都，統治蜀地二十五年以後，建元九年（373）四川的大部分地區又爲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前秦所控制。前秦瓦解（394）後不久，成都又陷入割據的局面。義熙九年（413）劉裕派部將從割據者譙縱手中收回成都，自此以後至南梁承聖二年（553）西魏奪取蜀地以前，四川一直隸屬於南朝。由此觀之，四川與南、北兩地的文化皆互有交涉。過去學界多關注四川出土南朝造像與江南佛教與建康造像的關係，論述甚豐，但最近也有一些學者觀察到，四川出土的南朝造像也受到北方造像的影響。雷玉華指出，四川從地域和文化上看，與西北和長安都更接近，而與建康相對較遠，在南朝宋齊以前受建康的影響也相對較小。現在已發現的成都南朝造像中早期佛像比較粗壯，服飾、臉形雖已漢化，但體格卻與北方太和改制以前的造像有些相像，這種粗壯的風格在太和改制以前的雲岡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河西和中原地區的石窟寺造像均可發現。此外，四川南朝第一期造像中出現的交腳彌勒菩薩，在五世紀上半葉的北涼石塔相當流行，佛像背後所飾的七佛題材也出現在北涼石塔上。四川南朝早期造像與西北造像淵源甚深，這種可能性也可從地理交通、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上得到證實。⁵⁰霍巍也談到，四川茂縣出土的齊永明三年（483）造像碑的小龕爲圓拱頂，帶有桃形的龕楣，龕內造像的衣紋作U形，垂懸於台座上呈三瓣

48 參見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76；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爲中心〉，頁168。

49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76。

50 雷玉華，〈四川南北朝造像的分期及淵源諸問題〉，收入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20-221。

式，類似的龕像亦見於北涼石塔，而此碑的供養者係「西涼匱比丘釋玄嵩」，更印證了齊永明造像碑與涼州造像的密切關係。另外，成都西安路出土的齊永明八年（490）彌勒佛三尊像，背面刻一房形龕，居中為一尊交腳彌勒菩薩坐像。成都市商業街出土的齊建武二年（495）觀世音佛三尊像，背面龕內也刻有一尊交腳彌勒菩薩像。這種交腳彌勒菩薩像為涼州造像流行的母題，帶有濃厚的涼州佛教造像色彩。⁵¹ 由於目前四川出土的南朝造像，不乏受到北方造像影響的作品，因此推測，上述這件蕭梁的維摩詰經變的祖型可能也受到北方的影響。

三、五胡十六國、北朝的維摩詰信仰與圖像

（一）五胡十六國

北方維摩詰信仰的發展較南方遲緩，敦煌遺書中有一卷後涼麟嘉五年（393）王相高寫《維摩詰經》（上博 2405），是現存最早的《維摩詰經》寫本，係王相高據支謙本抄寫。⁵² 鳩摩羅什的傑出弟子僧肇（384-414）「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⁵³ 後秦姚興（366-416）也好讀《維摩詰經》，「每尋翫茲典以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故於弘始八年（406）「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⁵⁴ 鳩摩羅什翻譯此經後，不但親自為之作註，他的高足、人稱「關中四聖」的竺道生（355-434）、僧肇、僧叡（355-440）、道融都曾為《維摩詰經》作注疏，《維摩詰經》遂成為長安佛教圈中的顯學，維摩詰信仰在關中地區很快地流傳開來。依據僧肇《注維摩詰經》，鳩摩羅什、竺道生、道融和僧肇的注疏主要是辨析名相，詮釋經義，與南方融合玄理的講經風氣迥然不同。

51 霍巍，〈齊梁之變：成都南朝紀年造像風格與範式源流〉，《考古學報》，2018年3期，頁315-320。

52 鄒清泉，〈虎頭金粟影：維摩畫像研究獻疑〉，《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4期，頁133。

53 （梁）慧皎，《高僧傳》，卷6，〈釋僧肇傳〉，頁365上。

54 （後秦）僧肇選，《注維摩詰經》，收入《大正藏》，冊38，卷1，〈維摩詰經序〉，頁327中；（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收入《大正藏》，冊55，卷8，〈維摩詰經序〉，頁58中。

現存最早的維摩詰經圖像見於甘肅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中，此窟第 6 號龕龕側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題記。該窟第 11 號壁畫（圖 2）畫帷帳中，一菩薩半臥於床榻上，頂有華蓋，面形渾圓，頭有圓光，頂束髮髻，長髮披肩，上身袒露，兩手前舉，肩披天衣，下著長裙。菩薩左側有一束髻長髮、頭有圓光的侍者。二者之間墨書榜題「維摩詰之像 / 侍（當作侍）者之像」，足證畫中的臥榻菩薩乃維摩詰。從畫中人物的姿勢和侍者的出現來看，此鋪壁畫應與〈文殊師利問疾品〉無關，因〈文殊師利問疾品〉提到，文殊菩薩問疾時，維摩詰「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⁵⁵ 也就是說文殊菩薩問疾時，維摩詰的方丈室中並無侍者。此一畫面當是依據〈方便品〉所作，表示維摩詰現身有疾，為前來問病的衆生宣說是身無常、無我，並不真實，當樂佛身的道理，此時維摩詰並未摒除侍者。

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第 10 號壁畫（圖 3）有兩層，上層原畫一佛二菩薩像，佛結跏趺坐，作說法狀，左側墨書「釋迦牟尼佛」。左側脇侍已佚，右側為一菩薩立像，頂有圓光，頭戴寶冠，胸佩項圈，兩手殘損，上身袒露，肩披天衣，下著長裙，左上方墨書榜題「維摩詰之相」。其下層壁畫，露出坐佛一角，其旁墨書「釋迦文佛」，佛左側畫一菩薩坐像，手結禪定印，榜題為「文殊師利」。⁵⁶ 有的學者依據圖像布局對稱的原則推測，表層釋迦牟尼佛左側的菩薩可能為文殊菩薩。⁵⁷ 若此推測成立，這鋪壁畫則為目前最早將《維摩詰經》三位主要說法者——釋迦佛與文殊、維摩詰——並列的實例，然而在配置上，三者仍有主從之分，中央的釋迦牟尼形體較大，左右的菩薩則形體較小。此外，第 24 號壁畫最下方殘存一幅維摩詰、文殊對坐圖，其旁有榜題「文殊師利維摩詰」。⁵⁸ 此鋪壁畫雖然保存不全，卻開北方以維摩詰和文殊菩薩成對出現的先河，在北方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上十分重要。以上三幅畫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維摩詰經圖像，至少有兩幅的維摩詰作菩薩裝，與南方流行的居士造型大異其趣，就風格而言，應係當地畫工所創。

55（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收入《大正藏》，冊 14，卷中，〈文殊師利問疾品〉，頁 544 中。類似的經文亦見於（吳）支謙譯，《維摩詰經》，收入《大正藏》，冊 14，卷上，〈諸法言品〉，頁 525 中-525 下。

56 董玉祥主編，《炳靈寺一六九窟》（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頁 7。

57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228；于向東，〈6 世紀前期北方地區維摩詰經變的演變——兼論與南朝佛教圖像的關聯〉，頁 12。

58 吳茲、魏文斌，〈甘肅中東部石窟早期經變及佛教故事題材考述〉，《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頁 20。

永靖炳靈寺石窟地近長安，這些維摩詰經圖像繪製於西元 420 年左右，距鳩摩羅什在長安翻譯《維摩詰經》不過十餘年，很可能是依據鳩摩羅什所譯《維摩詰所說經》繪製而成，是長安佛教影響下的產物，也是關中地區維摩詰信仰流行的見證。

值得注意的是，《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提到，「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⁵⁹ 炳靈寺第 169 窟出現菩薩形的維摩詰像，與經典所載的居士身分有所出入，也與後來手持塵尾、坐於榻上的維摩詰居士形象大相逕庭。石松日奈子已經指出，「位於河西走廊東端的炳靈寺，其維摩造型不同於中原、江南地區的義理佛教，大概是以具有印度風格的大乘『菩薩』的形象來表現的」。⁶⁰ 細讀經文，筆者發現這種菩薩造型的創造實有經典依據。在〈文殊師利問疾品〉中文殊菩薩多次稱維摩詰為「問疾菩薩」，維摩詰也多次自稱「有疾菩薩」；⁶¹ 〈香積佛品〉又言：

（香積）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⁶²

由於炳靈寺第 169 窟畫工繪製維摩詰時沒有粉本，所以很可能依據經文，將維摩詰塑造大乘菩薩的樣貌。

（二）北朝

北魏（386-534）為鮮卑族拓拔氏建立的國家，原住在大興安嶺附近，為一游牧民族，本不信佛，後來與中原和後趙（319-351）交通，始知佛法。太祖道武帝（371-409；386-409 在位）的道人統法果提出「皇帝即如來」的主張，更促進了北魏佛教蓬勃的發展。

59（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上，〈方便品〉，頁 539 上。

60 石松日奈子，〈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為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收入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11。

61（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文殊師利問疾品〉，頁 544 下 - 545 中。

62（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下，〈香積佛品〉，頁 552 中。

孝文帝（467-499；471-499 在位）「善談莊老，尤精釋義」，⁶³「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⁶⁴並「集沙門講佛經，因命（裴）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⁶⁵他還對諸王及侍官說：「朕每玩《成實論》，可以釋人染情。」⁶⁶孝文帝又延請精通《涅槃》、《法華》、《維摩》、《小品》和《成實論》的江南名僧曇度（?-489）到平城講經，曇度「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元宏，即孝文帝）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⁶⁷同時他又下〈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⁶⁸凡此種種在在表明，孝文帝的崇佛已深涉義理。北方義學在孝文帝的推動下，日漸受到社會的重視。

孝文帝稱為「今日文宗」的崔光（451-523），「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⁶⁹其弟出家為僧，法號慧順，「講《十地》、《地持》、《華嚴》和《維摩》，並立疏記。」「隨有講會，眾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四州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⁷⁰

宣武帝（483-515；499-515 在位）也是一位注重佛教義學的皇帝，他「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⁷¹「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沙門條錄，為《內起居》焉。」⁷²永平二年（509）十一月己丑，宣武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⁷³上既崇之，下彌企尚，淮陽王元尉、河東王元苟、東陽王元丕、淮南王元他、恒州刺史陸政都讀誦《維摩詰經》。⁷⁴

63（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冊1，卷7下，〈高祖紀下〉，頁187。

64（北齊）魏收，《魏書》，卷45，〈韋閔傳附族子纘傳〉，冊3，頁1014。

65（北齊）魏收，《魏書》，卷38，〈裴駿傳附子宣傳〉，冊3，頁1023。

66（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冊8，頁3040。

67（梁）慧皎，《高僧傳》，卷8，〈釋曇度傳〉，頁375中。

68（唐）道宣，《廣弘明集》，卷24，〈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頁272下。

69（北齊）魏收，《魏書》，卷67，〈崔光傳〉，冊4，頁1499。

70（唐）道宣，《續高僧傳》，卷8，〈齊鄴下總持寺釋慧順傳〉，頁484中。

71（北齊）魏收，《魏書》，卷8，〈世宗紀〉，冊1，頁215。

72（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冊8，頁3042。

73（北齊）魏收，《魏書》，卷8，〈世宗紀〉，冊1，頁209。

74（唐）法琳，《辯正論》，收入《大正藏》，冊52，卷4，〈十代奉佛篇下〉，頁514中-514下、頁515下。

隨著維摩詰信仰的日漸普遍，北方對該經的誦持、講解與注疏也應時而生。據《續高僧傳》記載，北齊（550-577）的道憑（488-559）⁷⁵、曇遵⁷⁶、法上（495-581）⁷⁷、曇衍（503-581）⁷⁸都讀誦《維摩詰經》，北周（557-581）的慧命講《維摩經》。⁷⁹ 北朝為《維摩詰經》作疏者有北魏的道辯，北齊的慧順、僧範（476-555）、靈詢、慧光等。敦煌北朝寫本中，尚有數件鳩摩羅什翻譯《維摩詰所說經》的注疏，如 S2106 寫卷為北魏景明元年（500）曇興於定州豐樂寺寫《維摩義記》、延昌二年（513）張顥寫《維摩義記》、北京存辰 032 西魏大統三年（537）許瓊瓊寫《維摩經義記》、P2732 大統五年（539）龍華二儒共校定的《維摩詰義記》、大統五年慧隆寫《維摩詰經注》、P2273 大統十四年（548）法鸞寫《維摩詰義記》。⁸⁰

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佛教發展狀況不同。南朝重義解，偏玄理；北朝則重修持，尚功德，所以二地維摩詰信仰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有所區別。根據敦煌寫經的題記，除了供養、流通之外，不乏以抄經累積功德，迴向國家、親眷、己身等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了《維摩詰經》。如敦煌寫卷 P4506B〈金光明經卷二〉的題記稱：「皇興五年（471）歲在辛亥，大魏定州中山郡盧奴縣……張壘主、父宜曹，諱曷、息張保興，自慨多難，父母恩育，無以仰報，……興造素經《法華》一部、《金光明》一部、《維摩》一部、《无量壽》一部，欲令流通本鄉，道俗異翫。願使福鍾皇家，祚隆萬代，祐例丘久，亡母託生蓮華，受悟无生，潤及現存，普濟一切羣生之類，咸同斯願。」⁸¹ S2724〈華嚴經卷三〉的題記言：「……廣寫眾經，《華嚴》、《涅槃》、《法華》、《維摩》、《金剛般若》、《金光明》、《勝鬘》。冀福鍾亡兄，騰神梵鄉，遊形淨土，體悟无生，早苦海（一字脫）。普及含靈，齊成正覺。大魏正光三年（522）歲次壬寅四月八日都訖。」⁸² 上海圖 137〈維摩詰經疏卷一〉的題記載：「大代普泰二年（532）歲次壬子三月乙丑廿五日己丑……瓜州

75（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8，〈齊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頁 484 中。

76（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8，〈齊鄴中釋曇遵傳〉，頁 484 上。

77（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8，〈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頁 485 上-485 下。

78（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8，〈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頁 487 下。

79（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7，〈周灑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頁 561 上。

80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 174-175。

81 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頁 91。

82 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 106。

刺史東陽王元榮，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軍事失利，於茲多載。天子中興，是得遣息叔和，謁闕修受。弟子年老痼患，冀望叔和早得迴還。敬造《維摩疏》百部供養。」⁸³ 五島美術館藏敦煌寫經〈大方等大集經卷二〉的題記言：「大代大魏永熙二年（533）五月七日，……瓜州刺史東陽王元太榮，……仰為比沙門天王，敬造《大集》一部十卷、《法華》一部十卷、《維摩》一部三卷、《藥師》一部一卷，合廿四卷。觀天王成佛，弟子所患永除，四體休寧，所願如是。」⁸⁴ 這些都是把寫經視為作功德的例子。

僧肇〈維摩詰經序〉言：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絕妙之稱也。……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為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為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為名焉。⁸⁵

僧叡〈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亦云：「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眾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⁸⁶ 二者都在強調維摩詰具有不可思議的神通力，這樣思潮影響了北方的維摩詰信仰。端方編《陶齋藏石記》載〈高僑為妻王江妃造木版〉，文云：

齊武平四年（573）歲次癸巳七月乙丑朔六日庚午，釋迦文仏弟子高僑敢告：「□灣里地振坦國土高僑元出冀州渤海郡，因宦仍居青州齊郡益都縣澠□里。其妻王江妃，年七十七，遇患積稔，醫療無損，忽以今月六日命過壽終。……江妃生時，十善持心，五戒堅志，歲三月六，齋戒不闕。……江妃命終之時，天帝抱花，候迎精神，大權□往，接待靈魂。敕汝地下女青，詔書五道大神、司坡之官，江妃所費衣資雜物、隨身之具，所逕之處，不得訶留。若有留詰，沙訶樓陀碎汝身首如阿梨樹枝。來時忿忿，不知書讀是誰？書者觀世音，讀者維摩大士。故移，急急如律令。」⁸⁷

83 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117。

84 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頁118-119。

85（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維摩詰經序〉，頁58上-58中。

86（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毘摩羅詰提經義疏序〉，頁58下。

87（清）端方，《陶齋藏石記》，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

根據文末「書者觀世音，讀者維摩大士」云云，可知其作用正是爲了鎮邪，與喪葬禮儀中傳統的祛除妖魔或護衛靈魂的主題密切相關，說明北朝晚期，在喪葬的俗信仰中，維摩詰是一位具有神力的神祇。⁸⁸北周道安的〈檄魔文〉亦稱：「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權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咤則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眾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⁸⁹可見道安視維摩詰具有超越惡魔的神力，爲協助釋迦征伐天魔的使者之一。⁹⁰上述這些資料顯示，在北方，維摩詰信仰不只在上層的貴族和知識分子間流傳，同時已深入了庶民社會，北魏就出現以「維摩」爲名字的人物。《魏書》卷四十一〈源賀傳附孫子雍傳〉載：「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甄棠橋，（源）子雍（488-527）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⁹¹北魏永安三年（530）〈僧智薛鳳規等道俗造像碑〉碑陽第三列題名中也發現「姪薛唯摩」一名，⁹²這些都是北方維摩詰信仰普及於民間的證明。

雖然從文獻記載來看，北朝與維摩詰信仰相關的資料不能與南朝相提並論，但豐富的北朝維摩詰經像遺存，南朝卻難望項背。以下將分 1. 北魏（386-534）、2. 東、西魏（534-550；535-557），和 3. 北齊（550-577）、北周（557-581）三個階段進行作品討論。

1. 北魏

北魏中期在義理思潮興起的影響下，維摩詰經圖像也應運而生，筆者目前發現五件遺例，⁹³皆爲孝文帝時期之作，兩例爲金銅佛，三例爲石窟造像。北魏中期的兩例金銅佛中，一例爲延興三年（473）劉琛造釋迦多寶佛的立像，此作的正

文豐出版公司，1982），冊 11，卷 13，頁 8103。

88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 193-194。

89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 29，〈檄魔文〉，頁 344 下。

90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 221-222。

91 〈北齊〉魏收，《魏書》卷 41，〈源賀傳附孫子雍傳〉，冊 3，頁 930。

92 顏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圖錄 29，頁 71、74。

93 另有一件河北易縣出土的和平六年（465）交腳菩薩殘像，此像僅存腹部及雙腿，背光背部造像題記上方尚存一列人物，最左方帳下有一頭有圓光、身著交領衣的人物，於一低臺上跏坐，身後有屏風，金申稱此人物手持羽扇，是目前已知單尊石造像上表現維摩詰最早之例。（金申，〈易縣北魏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文物》，1997 年 7 期，頁 62。）然細審作品圖版，此人物頭戴冠，雙手握拳前舉，沒持塵尾，與常見的維摩詰形像特徵不符，故本文未收錄。

面爲二尊立佛，題記稱「爲亡父母造刀（當作多）保佛」。二立佛背光的背面則刻畫著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對坐像（圖4），左側的維摩詰頭戴巾幘，身披大襖，在一屋形龕內，跏趺坐於方形矮榻上。右側的文殊頭有圓光，右手執物，跌坐於一蓮花座上。另一例爲太和元年（477）的釋迦牟尼佛坐像，此像背光背面的圖像內容豐富，分爲三層（圖5-1），最下層爲佛誕與九龍浴佛等情節，中層爲初轉法輪，最上層（圖5-2）的中央是釋迦多寶二佛並坐龕，龕右側的維摩詰頭戴巾幘，身披大襖，右手持麈尾，在一有方形背屏的坐具上跏坐。龕左側的文殊頭有圓光，右手持一蓮苞，左手置於大腿之上，在一方臺上結跏趺坐。根據題記，劉琛爲博陵饒陽（今河北保定市南方）人，⁹⁴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像的供養人是安熹縣堤陽（今河北定縣東三十里）人，⁹⁵二地北魏時皆屬定州，足證五世紀的七〇年代，河北定州地區已有維摩詰信仰的流傳。

除了河北造像外，在雲岡石窟的第二期（471-494）洞窟中，發現三例維摩詰經圖像，以第7窟的年代最早。雲岡第7窟爲孝文帝初期所開鑿的洞窟，⁹⁶維摩詰與文殊菩薩出現在此窟主室南壁中段、入口的兩側（圖6-1、6-2），隔門對坐。入口東側維摩詰斜坐於垂帳龕內，頭戴尖頂胡帽，面蓄長鬚，身著交領胡服，作鮮卑貴族樣貌，爲一居士。身略後傾，右手撐榻，左手持桃形麈尾，下身風化。背屏後方有一侍者。入口西側爲文殊，頂有華蓋，右手於胸前執一植物，左手於腹前持珠，右腳下垂，左腿彎屈，舒坐於矮榻之上，四周有天人禮拜。

雲岡第1窟的南壁東側，開鑿於雲岡第二期的後半，⁹⁷南壁東側維摩詰和文殊坐於一屋形龕中（圖7），龕檐下方飾垂帳，維摩詰和文殊菩薩的布局不對稱。龕中維摩詰的身形較大，占據此龕的三分之二，頭後有圓光，身著交領衣，在方形矮榻上垂足而坐，右手後伸。身後尚見鋪著錦鍛的三角形背屏，這種背屏在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和炳靈寺第169窟的交腳菩薩像和半跏思惟菩薩像的身後均曾發

94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11卷4期（1994夏），頁44。

95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頁45。

96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79；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頁130；因幡聰美著，胡皓然、劉軍森譯，〈關於雲岡石窟第7、8窟中設計性的考察〉，《石窟寺研究》，9輯（2019.6），頁60。

97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頁81；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93。

現。此像的頭部和左手已殘。文殊菩薩約為維摩詰的一半，出現在此龕的左側，頭部已殘，頭後有圓光，倚坐於方榻之上，與維摩詰相對。在二者的四周有聽法的菩薩、比丘和人們，計五身，雙手合十，或跪或立。趙昆雨指出，屋形龕頂左上角原有兩身托鉢飛天，代表〈香積佛品〉中化菩薩至香積佛處求得香飯的情節。⁹⁸ 此件作品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維摩詰經變（詳見下論）。

開鑿於第二期後半的雲岡第 6 窟，⁹⁹ 在南壁明窗和門拱之間也發現一鋪維摩詰經圖像（圖 8）。屋形龕檐下飾三角垂帳紋，中間為釋迦牟尼佛，其在金剛座上結跏趺坐，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施與願印，作說法狀。左側為維摩詰，側身而坐，面向至尊與文殊，其面有鬚鬚，右手持桃形麈尾，左手後撐，頭戴尖頂氈帽，身著交領胡服，長及於膝，腰束繫帶，下著長褲。身略後傾，右手撐榻，雙足下垂，坐於矮榻之上，姿勢與雲岡第 7 窟和第 1 窟類似，唯其保存狀況完整。身後也有三角形背屏。右側的文殊側身而坐，面向至尊與維摩詰，頭有圓光，右手舉於胸前，四指彎屈，在矮榻上舒坐，身後亦有三角背屏。釋迦牟尼、維摩詰和文殊菩薩為《維摩詰經》的主要說法者，此鋪雕刻旨在表現三者弘宣《維摩詰經》的場面。¹⁰⁰ 盧少珊指出釋迦牟尼臺座的兩側跪著禮拜的人物乃〈觀衆生品〉中的舍利弗和天女，¹⁰¹ 不過仔細觀察，臺座右側頭圓光的人物沒有剃髮，乃一童子，並非比丘，而且二者皆呈跪姿，不作論談狀，故筆者對此詮釋不能苟同。

由於迄今，我們僅在定州和平城（今山西大同）二地發現北魏中期的維摩詰經圖像，說明當時此一圖像尚不普遍。根據上述諸例，北魏中期的維摩詰像皆作胡裝的居士形，或跪坐，或垂足倚坐，其樣貌不但和南方流行的維摩詰像有別，與炳靈寺第 169 窟菩薩形的維摩詰像也無傳承關係，應是北魏工匠在《維摩詰經》文本的基礎上，自創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五例的維摩詰與文殊，皆採對坐論法的樣貌，說明這種形式已成爲北魏中期維摩詰經圖像的重要表徵，也確立

98 趙昆雨，〈雲岡石窟維摩詰圖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 年 7 期，頁 47。

99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頁 81；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頁 93。

100 張華認爲，此龕造像是根據《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雕鑿的（張華，〈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收入雲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 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240-241），不過其援引的經文乃在描述維摩詰以神通力持大眾並獅子座和文殊菩薩同赴庵摩羅樹園，稽首佛足的內容，與此畫面的表現不符，故不採用。

101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66。

了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的基本結構。

維摩詰和文殊是《維摩詰經》的要角，過去的研究多將維摩詰與文殊對坐，解讀為依據〈文殊師利問疾品〉所作的維摩詰經變，通過文殊菩薩問疾時與維摩詰論辯的場面，烘托維摩詰居士的能言善道、辯才無礙。但《維摩詰所說經》的十四品裡，第五〈文殊師利問疾品〉、第六〈不思議品〉、第七〈觀衆生品〉、第八〈佛道品〉、第九〈入不二法門品〉、第十〈香積佛品〉和第十一〈菩薩行品〉都有維摩詰和文殊菩薩的出現，情節發生的地點大抵都在維摩詰的方丈室裡，且在多品中維摩詰、文殊以論辯或對談的形式，闡揚此經的核心理論——諸法性空的要旨。誠如盧少珊¹⁰²、項一峰¹⁰³所言，維摩詰與文殊菩薩對坐論道的圖像，應代表《維摩詰經》全經的旨趣，而不僅只是在表現〈文殊師利問疾品〉的內涵，北魏普泰元年（531）蘇進達等邑義造像碑即為佐證。此碑碑陽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圖9）華帳龕內維摩詰和文殊相對而坐，文殊身側有三位比丘圍繞，過去多認為是一鋪典據〈文殊師利問疾品〉的維摩詰經變。然而在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間的題記云：「維摩 / 詰現患於方丈 / 室時，遣化菩薩，天 / 女散花。」「維摩詰現患方丈室時」當與〈方便品〉和〈文殊師利問疾品〉所言維摩詰示疾有關，「遣化菩薩」典出〈香積佛品〉，此品言舍利弗聽道時想「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維摩詰以神通力，派遣化菩薩至衆香國向香積佛求取香飯。而「天女散花」的故事則出現於〈觀衆生品〉中。由此碑像的題記來看，碑像中簡單的維摩詰和文殊對坐的畫面，實則寓意豐富，不僅僅代表〈文殊師利問疾品〉的情節，也包含了〈方便品〉、〈香積佛品〉和〈觀衆生品〉的內容。因此認為不具故事情節的維摩詰、文殊對坐作品應代表全經的旨趣，而不只是代表〈文殊師利問疾品〉，筆者稱這類作品為「維摩詰經像」，以便與畫面中表現諸品內容、具敘事色彩的「維摩詰經變」作一區別。換句話說，依畫面特徵，筆者將維摩詰經圖像分為維摩詰經像和維摩詰經變兩大類。

無論在定州或雲岡，都發現了手持麈尾的維摩詰像，顯示自北魏中期以來，麈尾已成為維摩詰的重要持物。麈尾是用麋鹿的尾毛製成的器具，魏晉南北朝時，清談家們為了顯示自己的風流倜儻，手裡經常持此雅器。《世說新語》〈文

102 盧少珊，〈北朝隋唐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70。

103 項一峰，〈6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石窟寺研究》，10輯（2020.6），頁64。

學〉載：「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¹⁰⁴《世說新語》〈容止〉言：「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下捉白玉柄塵尾，與手都無分別。」¹⁰⁵又依據與塵尾有關的詩銘來看，塵尾的功用在於名士清談時，「本持談妙理」、「引飾妙詞」。¹⁰⁶由於當時名士與高僧交往頻繁，不少高僧亦參與玄談，塵尾便成爲許多高僧講經說法時的道具，如支遁在祇洹寺中講經時，「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暢。」¹⁰⁷竺道生「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¹⁰⁸釋慧通「每塵尾一振，軒蓋盈衢。」¹⁰⁹

中古名士清談，多採主客問答的方式進行，主是主講人，手執塵尾作道具，以助談鋒，客爲問難者，通常手中不拿塵尾。¹¹⁰有趣的是，北魏中期的維摩詰經圖像中，維摩詰和文殊作對坐論法狀，與清談論辯的形式相似，維摩詰手持塵尾表明他在二者論辯的過程中，位居「主」位，正與《維摩詰經》的經旨相符。雖然有學者指出，由於南方的清談之士對維摩詰非常熟悉，而維摩詰的行徑又和南方名士雷同，所以手持塵尾的維摩詰像可能是南方藝師首創。¹¹¹然而此一推測並無文獻資料可作證明，《歷代名畫記》和〈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也都沒有提到顧愷之筆下的維摩詰手持塵尾，且南朝出現此類維摩詰像的年代較北魏中期遲了數十年。以目前資料來看，最早的維摩詰、文殊對坐的圖像不但出現在北方，而且早在北魏中期即成定式，故而推測，北魏藝匠很可能在製作這種圖像時，依據《維摩詰經》的文本，特別在維摩的手中加上了塵尾，以彰顯他爲論辯中主講者的身分。換言之，手持塵尾的維摩詰也有可能爲北魏匠師所創。

現存北魏中期的五例中，除了第 1 窟爲維摩詰經變，其他四例皆爲維摩詰經

104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篇〉，頁 212。

105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容止篇〉，頁 611。

106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頁 188。

107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賞譽篇〉，頁 479。

108 (梁)慧皎，《高僧傳》，卷 7，〈釋竺道生傳〉，頁 367 上。

109 (梁)慧皎，《高僧傳》，卷 7，〈釋慧通傳〉，頁 374 下。

110 白化文，〈塵尾與魏晉名士清談〉，《文史知識》，1982 年 7 期，頁 80；范子燁，〈六朝名僧與塵尾風流〉，《文史知識》，2017 年 3 期，頁 73。

111 Larua Gardner Heyrman, "The Meeting of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Chinese Innovation in Buddhist Iconography," 129; 蕭玉真，〈中國維摩造像的起源與開展——以隋唐敦煌維摩變壁畫爲研究重心〉(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1999)，頁 21。

像，雲岡第 7 窟的維摩詰和文殊隔門對坐；第 6 窟的維摩詰和文殊分居釋迦牟尼佛的兩側；延興三年劉琛造多寶佛立像背光背面維摩詰和文殊相向而坐；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背光背面的維摩詰和文殊，分別坐在多寶佛龕的兩側，這四種維摩詰經圖像的配置方式奠定了北朝維摩詰經像構圖的基礎。不過，北魏中期的維摩詰圖像，定州地區皆為跪坐，雲岡則為側身垂足倚坐，二者似有區域之別。

北魏晚期，宣武帝和名臣崔光都曾講《維摩詰經》，此經備受推崇。在此風潮下，維摩詰經圖像數量激增，分布日廣，如今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都有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圖像的發現，其中又以河南最多。據張乃翥的統計，龍門石窟維摩詰經圖像多達 129 例，堪稱中國石窟之最，絕大部分為北魏晚期之作，尤盛於宣武、孝明（510-528）二世。¹¹²

龍門石窟古陽洞上層八大龕約完成於景明（500-503）前後，¹¹³ 其中北壁第三龕（北壁第 234 龕，又稱魏靈藏造像龕）和第一龕（北壁第 134 龕）皆有維摩詰經像的雕造，為龍門石窟維摩詰經圖像最早的作例。魏靈藏造像龕居中為一尊手結禪定印的坐佛，龕內背光兩側浮雕維摩詰經像，右側為維摩詰（圖 10-1），上半身殘損，著大袖漢式袍服，左手持蒲扇形塵尾，右手扶三足隱几，右腿前伸，左腿支起坐於榻上，榻下置鞋，身後有屏風，左側有一侍女，屏風後有一比丘和一侍女雙手合十，後有數列聽法比丘。左側為文殊（圖 10-2），頂有華蓋，兩手前伸，作說話狀，一腿平屈、一腿垂於矮榻前舒坐，身後有屏風。右側有一侍女，屏風後為數列聽法比丘。北壁第 134 龕的主尊為禪定坐佛，維摩詰經變出現在尖拱龕龕楣的兩側，右側為維摩詰（圖 11），帷帳中，維摩詰身形清癯，左手持桃形塵尾，身著漢式大袍，身體後傾，右腿平屈於榻上，左腿下垂，舒坐於大榻上，身後有圍屏，榻後有一侍女。左側的文殊今已殘失。這兩鋪維摩詰經像的維摩詰和文殊或於龕內隔主尊對坐，或在龕楣上隔龕對坐，這種配置方式可以看作是雲岡第 6 窟維摩詰經圖像（圖 8）布局的衍變。¹¹⁴ 不過，這兩例中維摩詰的形貌坐姿，或衣著樣式，都和雲岡中期的維摩詰形貌大異其趣，這應和太和十八年

112 張乃翥，〈龍門石窟維摩變造像及其意義〉，《中原文物》，1982 年 3 期，頁 40-41。

113 溫玉成，〈古陽洞研究〉，收入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研究論文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153。與溫玉成相同，石松日奈子也認為正壁三尊和最上層八大龕均為古陽洞第一期工程，不過其認為第一期的施工時間為 493 年左右至 505 年前後，與溫玉成略有出入（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頁 133-143）。

114 張乃翥，〈龍門石窟維摩變造像及其意義〉，頁 40。

(494)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全面推行漢化，積極汲取南朝文化的養分有關。這兩鋪維摩詰經變中，維摩詰的姿勢悠閒不羈，魏靈藏龕內的維摩詰坐姿更與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中出土的磚畫〈竹林七賢和榮啓期像〉造型相近，這種坐姿在北魏晚期的維摩詰經圖像中屢見不鮮。此外，北魏中期雲岡石窟中所見的三角背屏，在龍門石窟中已被屏風取代。同時，維摩詰又手扶三足憑几，這些新元素的出現都受到南朝維摩詰像的影響。有些龍門石窟的維摩詰像雖然上承北魏中期的雲岡傳統，兩腿下垂坐於矮榻上，可是也前憑隱几（圖 12），顯然流行於南方的隱几已成為北魏晚期維摩詰圖像的重要特徵。

古陽洞中層八大龕中的北壁第三龕（北壁第 258 龕），為永平四年（511）安定王元燮¹¹⁵ 造交腳彌勒菩薩五尊像龕，龕內主尊背光右側為維摩詰（圖 13-1），方形帷帳內維摩詰居士左手持桃形麈尾，右手扶三足隱几，頭戴冠，著大袖袍服，外披鶴氅，趺坐上有帷帳的榻上。主尊背光左側為文殊（圖 13-2），趺坐於華蓋下，右手持如意，左手舉於胸前，是手持如意文殊菩薩的較早實例。¹¹⁶ 自此以後，如意便成為文殊菩薩重要的持物。《大正藏》卷八十五《古逸部》所收《惠遠外傳》稱，道安（312-385）「手把如意，身座寶臺，廣焚無價寶香，即宣妙義。」¹¹⁷ 可見如意亦為僧人宣說佛法的道具。因此，維摩詰經變中文殊菩薩手持如意，自在情理之中。

賓陽中洞是宣武帝為其父孝文帝所開鑿的洞窟，溫玉成指出此窟完成的年代當在延昌末至熙平初（515-517），¹¹⁸ 宿白認為則可以早到宣武帝末年。¹¹⁹ 賓陽中洞東壁入口兩側分為四層，最上層的南北兩側作維摩詰經變（圖 14-1），其配置方式顯然上承雲岡石窟第 7 窟的模式。這鋪維摩詰經變是龍門石窟中幅面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鋪。入口南側上層浮雕一帷帳，下置矮榻，維摩詰（圖 14-2）五官清秀，面露淺笑，頷下蓄鬚，頭戴小冠，身著褒衣博帶式服裝，手執麈尾，右

115 此龕的造像記已殘，溫玉成考證，這則造像記是安定王元燮永平四年十月十六日所造，見溫玉成，〈古陽洞研究〉，頁 156-157。

116 石松日奈子，〈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為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頁 19。

117 佚名，〈惠遠外傳〉，收入《大正藏》，冊 85，頁 1316 下。

118 溫玉成，〈龍門北朝小龕的類型、分期與排年〉，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216。

119 宿白，〈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頁 226。

腿支起，左腿前伸，背靠隱囊，表現超然不凡的氣質，這種造型的維摩詰像是龍門石窟的孤例。前文已述，依據黃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顧愷之〈維摩詰像〉可能已繪有隱囊，且顏之推（531-591）《顏氏家訓》記載，南朝齊梁時的貴游子弟多「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¹²⁰ 賓陽中洞背靠隱囊的維摩詰圖像顯然與南朝文化淵源甚深。此外，這尊維摩詰手中的塵尾上圓下方，與北魏中期所見桃形的塵尾不同，形狀與南朝徐陵（507-583）〈塵尾銘〉「員上天形，平下地勢」¹²¹ 的記述相符，此乃北魏晚期從南朝文化中汲取養分的又一證明。入口北側上層爲文殊（圖 14-3），頭有圓光，結跏趺坐，左手下垂，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豎起，被認爲是文殊菩薩特有的印相，¹²² 有學者認爲是在傳達文殊菩薩宣說「不二法門」的意涵。¹²³ 維摩詰的身前有一天女，文殊身前有一比丘，二者相對而立，這位比丘當爲舍利弗，此畫面是依〈觀衆生品〉所作。該品提及，維摩詰向文殊及其隨從弟子說明菩薩不但觀法如幻，觀衆生亦如幻，度化衆生，無所執著。此時天女散花，花落在弟子身上，便著不墮，佛弟子們用盡神力而不得去，然後天女與舍利弗便展開了一場精彩的辯論。在維摩詰帳後上方浮雕兩個方座（圖 14-4），其中一個方座下方尙具蓮臺，乃在描繪〈不思議品〉舍利弗起此方丈室無有床座，衆聽法菩薩、弟子當於何座念頭後，維摩詰居士現神通力，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高廣嚴淨的獅子座，來入維摩詰室的景象。此鋪維摩詰經變，除了維摩詰經像中所見的維摩詰和文殊對坐外，又增添了〈觀衆生品〉和〈不思議品〉的事情節，圖像內容趨於豐富，奠定了維摩詰經變日後發展的基石。

除了賓陽中洞外，蓮花洞南壁第 41 龕尖拱龕的上方有一鋪維摩詰經變浮雕（圖 15），龕楣右側的屋形建築中，文殊左手持如意，結跏趺坐於臺上，屋外有十二身聽法比丘。龕楣左側方頂帷帳中，維摩詰頭部半殘，右手持蒲扇形塵尾，左手扶隱几，悠閒自在地坐於矮榻上，帷帳外有聽法比丘數身。值得注意的是，

120（北齊）顏之推著，蔡宗陽校注，《新編顏氏家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勉學篇〉，頁 213。

121（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69，〈服飾部〉，下冊，頁 1216。

122 石松日奈子，〈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爲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頁 19。

123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頁 244；漆紅，〈立体『維摩詰經』としての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維摩詰經』造像研究—〉，《佛教藝術》，326 號（2013.1），頁 30。

帷帳左側有四個空著的矮榻，類似的表現亦見蓮花洞南壁第 40 龕。¹²⁴ 筆者推測，這些矮榻也可能在表現〈不思議品〉燈王借座的內容。另外，彌勒洞北二洞佛龕內的維摩詰經變中，維摩詰（圖 16）五官清秀，面蓄長鬚，頭戴小冠，著褒衣博帶式袍服，右手持麈尾，左手扶三足憑几而坐，右前方有一手持羽扇的天女，類似的人物在敦煌石窟初唐的維摩詰經變時有所見，¹²⁵ 無庸置疑此乃表現〈觀衆生品〉的內容。

梳理龍門石窟的維摩詰經圖像後發現，其圖像位置由龕內背光上方兩側，漸漸移至龕楣或龕楣外兩側，隨著盞頂龕的流行，又轉至盞頂龕龕楣兩側的上方。這些圖像大部分為維摩詰經像，表現維摩詰與文殊對坐論辯，有時兩側會出現侍女或弟子，但不具敘事內容。510 年代在維摩詰經像的基礎上，賓陽中洞發展出了維摩詰經變，除了維摩詰經像常見的維摩詰與文殊對坐外，增加了天女與舍利弗，以及燈王借座的畫面，故事性增強。不過整體而言，龍門石窟維摩詰經變的數量遠遜於維摩詰經像。

在河南的石窟中，除了龍門石窟外，孟縣萬佛山石窟¹²⁶ 和鞏縣石窟第 1 窟也都有維摩詰經圖像的雕造。鞏縣石窟第 1 窟東壁第 1 龕（圖 17）中，維摩詰和文殊皆採八分面的形式，相向而坐於一龕中，這種主體式配置方式的祖源可追溯至雲岡石窟第 1 窟（圖 7），只是此時維摩詰和文殊的體形等大，二者已採對等狀態。文殊左側立有一雙手合十的侍女，右側則為一手持花束的比丘，盧少珊認為這位比丘應代表〈觀衆生品〉中舍利弗去花的內容，¹²⁷ 筆者不以為然，因為畫面中既不見比丘揮去落花的動作，比丘身上也不見花的圖案，而文殊左側的侍女雙手合十，與天女散花的表現也不同。因此筆者認為此龕應為維摩詰經像龕，而非維摩詰經變龕。

北魏晚期河南的造像碑上也出現了維摩詰經圖像的題材，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神龜三年（520）交腳菩薩三尊像造像碑，¹²⁸ 碑陽的主體為一盞頂帷幕龕，龕楣

124 劉景龍編著，《蓮花洞——龍門石窟第 712 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圖 146；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圖 53。

125 賀世哲，《維摩詰經變》，圖 186、圖 190、圖 196。

126 宿白，《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頁 234。

127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71。

128 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95），圖 96。

右側雕結跏趺坐的文殊，左側雕垂足而坐的維摩詰。滎陽大海寺出土的孝昌元年（525）道晗造四面像，正面開一大龕，龕內雕交腳彌勒菩薩五尊像，主尊背光的右側維摩詰在方帳中左手持麈尾、右手扶几舒坐。左側文殊在屋形龕內右手持如意端坐。¹²⁹ 此二例的配置和表現方式與龍門石窟的維摩詰經像相同。松濱市美術館藏的張永造立佛三尊像，¹³⁰ 碑陰分爲兩層，下層爲維摩詰經變，右側維摩詰於方帳中扶几而坐，左側文殊於華蓋下手持如意結跏趺坐，兩者皆作八分面，相對而談，構圖和鞏縣第 1 窟相似。唯此作的維摩詰前有天女，文殊前有比丘舍利弗，二者相對而立，增加了表現〈觀衆生品〉的情節。

北魏末年，河南地區出現了大幅面的維摩詰經變。原在延津蔣村區清寺的孝昌三年（527）蔣伯仙造像碑，碑陽爲彌勒佛三尊像，碑陰淺浮雕，分爲四層，最上層爲一鋪佛說法圖，¹³¹ 第二層是維摩詰經變，第三、四層爲須達拏太子本生。其中，維摩詰經變（圖 18）採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左右對置的方式，維摩詰居右，在方帳中手持蒲扇形麈尾於折疊式屏風前結跏趺坐，屏風左側身形纖細、頭梳高髻、衣袂飄舞的女子，當爲天女。文殊居左，在懸掛瓔珞飄帶華麗的華蓋下右手持如意，結跏趺坐於須彌臺上。其右側立有一頭有圓光的比丘和一頭佩瓔珞的螺髻人物。從這尊比丘與維摩詰身側的天女相對而立的結構來看，當代表舍利弗。舍利弗身側的螺髻人物很可能是螺髻梵王，他是釋迦佛教化的娑婆世界實爲淨土的見證人。《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言：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爲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磧、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¹³²

129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北魏造像〉，圖錄 16，頁 93，線描圖見頁 103。

130 町田市立博物館，《浜松市美術館所藏小杉惣市コレクション中国の金銅仏・石仏》（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1994），頁 93。

131 曹德啓認爲這鋪說法圖是在表現〈佛國品〉的內容，主尊坐佛上方垂飾瓔珞飄帶，華麗異常的傘蓋，乃〈佛國品〉中釋迦佛施展神變，將五百長子者所供養佛的五百傘蓋合成的大華蓋（曹德啓，〈北朝石窟中淨土與菩薩道信仰〉（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18），頁 96）。然而此鋪說法圖中主尊坐佛的華蓋樣式與文殊菩薩的華蓋極爲相似，很難說明其具有特殊的意涵，因此筆者認爲此一說法值得商榷。

132（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上，〈佛國品〉，頁 538 下。

二組人物之間有聆聽維摩詰和文殊講論佛法的比丘和菩薩數身。畫面中間跪地比丘的身後有一樹，維摩詰的帳後以及文殊菩薩的華蓋後方也刻畫了樹木，同時第三層須達拏太子本生故事圖中的山巒也向上延伸，形成此鋪經變前景的一部分，全作描繪細膩，又增添了山水的元素，繪畫性強。

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永熙二年（533）趙見愔等造像碑，碑陽雕一立佛及二脇侍菩薩，碑陰上半部刻維摩詰經變（圖 19），下半部為供養人像。此鋪維摩詰經變分為上下兩列，各個情節對稱安排。上列中央為在盃頂龕中坐於蓮臺之上的坐佛，代表〈佛國品〉中說法的釋迦牟尼佛。釋迦佛左側的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在矮榻前閒適自在而坐，榻前有鞋。像前的榜題稱「此是維摩詰托疾方丈室時」，表現〈方便品〉中維摩詰示疾的情節。釋迦佛右側的文殊在華蓋下半跏趺坐，像前榜題云：「此是文殊師利問疾維摩時」，典出〈文殊師利問疾品〉。圖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皆面向居中的釋迦佛，構圖仍見雲岡第 6 窟（圖 8）的餘緒。維摩詰示疾的左側，一位侍者手持羽葆，羽葆下站一位身著漢服的王者，與一頭戴高冠者正在說話，題榜稱：「此是諸大國王來聽法時」，以簡約的手法描繪〈方便品〉中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前往問疾」¹³³ 的情景。文殊菩薩問疾的右側，一位頂有螺髻的高鼻人物和一位比丘對談，二者之間有蓮花、蓮蕾等。前方的榜題第一行數字漫患不清，金維諾的釋讀為「此是維摩詰見舍利弗，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時」，認為這位螺髻人物乃維摩詰，¹³⁴ 此說廣為學界所接受。¹³⁵ 金理那對此則榜題的釋讀則作「髻梵王舍利弗我見 / 此是（？） / 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認為刻寫的文句與〈佛國品〉有關，結螺髻者乃螺髻梵王。¹³⁶ 仔細研讀此則榜題，雖然第一行的前五個字十分模糊，但第四個「王」字隱約可見，再考慮此一人物的圖像特徵，筆者同意金理那的觀點，這則題記應釋為「此是髻梵王舍利弗，我見 / 釋迦牟尼佛土清淨時」，是在表現螺髻梵王向舍利弗解說釋迦牟尼佛土本來清淨，心淨則國土淨的道理，故二者間出現代表淨土的蓮花圖案。下列的中間為一

133（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上，〈方便品〉，頁 539 中。

134 金維諾，〈壁畫《維摩變》的發展〉，頁 197。

135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頁 147；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頁 173。潘亮文甚至進一步指出，此一情節見於〈弟子品〉。

136 金理那著，洪起龍譯，〈關於 6 世紀中國七尊像中的螺髻像之研究〉，《敦煌研究》，1998 年 2 期，頁 76。

地神雙手上舉托一博山爐。左側前方刻畫天女雙手前舉，作散花狀，空中尚有花朵飛舞，前有一人手持一莖花蕾，跪地禮敬，榜題言：「此是天女以花散菩薩大弟子時」。右側前方刻畫揚手去花的舍利弗，以及一立、一跪的比丘，榜題稱：「此是舍利弗請天女□花去時」。二者是在表現〈觀衆生品〉天女散花，舍利弗認爲此花不如法，急於去花的情節。天女的身後有一須彌座，座前有一隻獅子，座上有兩尊頭有圓光的菩薩，題榜稱：「此是諸大菩薩坐師子座時」。在舍利弗的身後有一獅子座，座後有兩手持蓮花立著的比丘和三位跪地禮拜的比丘，題榜稱：「此是大弟子禮拜師子座時」。此兩景均出自〈不思議品〉，該品提及維摩詰和文殊菩薩論法期間，舍利弗久立思坐，維摩詰便從東方須彌燈王佛處借來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的獅子座供衆人坐下。《維摩詰所說經》云：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延，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能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¹³⁷

天女身後所表現的乃文殊和諸菩薩俱安然入座的場景，而舍利弗身後的畫面則是表現佛的大弟子在獅子座前禮拜須彌燈王的情節。此組畫面清楚地說明大、小乘的優劣。此鋪維摩詰經變圖文並茂，包括了〈佛國品〉、〈方便品〉、〈文殊師利問疾品〉、〈觀衆生品〉和〈不思議品〉的情節，內容豐富，爲北魏晚期的精彩之作。

在山西方面，雲岡石窟尙保存約三、四十例遷都洛陽以後所雕的維摩詰經圖像。¹³⁸ 這些作品中，維摩詰多著漢服，秀骨清像，有些維摩詰像還前憑隱几，如第 5-36 窟西壁之例，¹³⁹ 明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從配置方式來看，以同龕對坐式和隔龕對坐式兩大類爲主，前者見於第 24、30、31 等窟，當是從雲岡第 1 窟的

137 (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不思議品〉，頁 546 中。

138 參見張華，〈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附表：雲岡石窟維摩詰、文殊菩薩對坐造像一覽表〉，頁 249-250；然而據趙昆雨的調查，雲岡現存維摩詰圖四十九幅，屬北魏中期者計五例，餘皆爲北魏晚期之作（參見趙昆雨，〈雲岡石窟維摩詰圖像研究〉，頁 40、45-48）。

139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冊 2，圖 83、圖 84b。

維摩詰經像（圖 7）發展而來；後者則如第 5-11、5-34、5-36、13A、35-1 等窟。隔龕對坐式又可分為龕外兩側和龕楣兩端兩型。龕外兩側型是指維摩詰和文殊雕於主龕的兩側，二者形體較大，如雲岡第 35-1 窟西壁下層（圖 20），帳形龕內雕一禪定坐佛，佛龕右側為文殊，右手施無畏印，結跏趺坐；左側為維摩詰身披鶴氅，手持麈尾，自在舒坐。配置方式與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像背面的維摩詰經像（圖 5-2）相近。龕楣兩端型是指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雕於主龕龕楣的兩側，二者形體較小，布局與龍門石窟的許多維摩詰經像類似，和龍門石窟相較，其構圖簡單，鮮少刻畫聽法的比丘和菩薩等，如第 5-36 窟的西壁龕（圖 21）。

據張華的考察，第 5-34 窟西壁盞形帷幕龕外左隅維摩詰像前雕一天女像，右隅文殊像前有一比丘像（舍利弗）。第 5-36 窟南壁門拱西側尖拱龕內雕坐佛，上層浮雕兩幅，一為維摩詰，像前有一天女像；另一為文殊像，像前有一比丘像（舍利弗），兩者相對侍立。這些造像都是根據〈觀衆生品〉所雕造。¹⁴⁰ 盧少珊又指出，第 13A 窟南壁交腳彌勒菩薩龕的龕楣上方，維摩詰和文殊於兩端對坐，二者之間分別侍立一俗裝侍女和一比丘，應為天女與舍利弗。上空及龕楣各刻畫一捧鉢天人飛行而至，表現〈香積佛品〉化菩薩送香飯的畫面。¹⁴¹ 這些雲岡北魏晚期的作品都增加了敘事的情節，應為維摩詰經變，較雲岡二期窟的維摩詰經像內容更加豐富。

雲岡北魏晚期第 14 窟前室西壁維摩詰經圖像（圖 22）是構圖較特殊的一例，在維摩詰和文殊中間，有一菩薩裝的人物，左手下垂持一物，右手提一珠形物，下有蓮臺。張華認為右手所提的圓形物為一鉢，故主張此造像是依據〈香積佛品〉的內容所雕。¹⁴² 盧少珊則主張此像「左手外伸，其下刻一花朵，作垂落狀」，推測為〈觀衆生品〉內容，表現散花天女或「華至諸菩薩即墮落」之菩薩。¹⁴³ 由於此菩薩狀人物右手的持物既不似鉢，也不類花，二位學者的推測均值得商榷。且此菩薩形體甚大，為維摩詰經圖像的孤例，所據經典根據為何？尚待進一步查考。

在北魏晚期雲岡石窟的維摩詰經變中，第 32-10 窟外壁上部之例（圖 23）值得注意。此鋪維摩詰經變的左側已殘，右側帳形龕中的人物雖然風化嚴重，但從其

140 張華，〈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頁 242-243。

141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81。

142 張華，〈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頁 241。

143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70-71。

姿態來看，當為維摩詰。帳形龕的左側有一天女，帳上有二天人捧鉢飛翔，是〈觀衆生品〉和〈香積佛品〉典型的表現。天女的身側有一樹，樹下尚存四身侍女侍立，皆作斜向布排，增加了畫面的縱深感。無論是表現立體的帷帳、具空間感的人物布局，以及樹木的刻畫，此鋪維摩詰經變都和簡樸的雲岡風格迥然不同，顯然受到河洛地區的影響。由此看來，北魏晚期洛陽文化也豐富了平城文化的內涵。

除了石窟以外，山西出土的石塔節和碑像也有維摩詰經圖像的發現。沁縣南涅水出土的石塔節中，發現一例維摩詰單身像（圖 24），其在飾有帳幔的屋形龕下，面蓄鬚髯，右手扶隱几，在矮榻上趺坐，這樣的表現僅見於石塔節中。原在山西南部道旁的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碑陰分爲四層，最上層爲立佛三尊像，第二層爲坐佛三尊像，第三層爲維摩詰經變（圖 25），第四層爲造像題記。這鋪維摩詰經變屬維摩詰和文殊菩薩主體的構圖方式，右側的文殊菩薩右手持如意，左手扶三足隱几，在華蓋下結跏趺坐，左右各有一雙手合十的侍者。身側榜題云：「文殊師利而自問疾」。左側的維摩詰在一屋室中，右手拿麈尾，左手扶隱几，右腿支起，左腿平伸，坐在榻上，身後有六位梳髻人物。身側榜題曰：「維摩詰□□□方丈室中」。維摩詰和文殊之間有四列聽法弟子，上方空中有二身童子和二身菩薩，左側菩薩的左手捧一飯鉢，應代表〈香積佛品〉化菩薩送香飯的場景。大同市北魏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造像碑殘碑，碑陽現存三層，第一層爲坐佛三尊像，第二層的屋形龕內雕一坐佛、二脇侍菩薩、二脇侍弟子以及二樹下半跏思惟像，第三層爲維摩詰經像（圖 26）。這鋪維摩詰經像中央開一屋形龕，龕中雕坐佛三尊像，佛龕右側雕維摩詰著寬袖袍服，右手持麈尾，跏坐，有四列聽法弟子圍繞。佛龕左側雕文殊，右手前舉，跏坐，也有四列聽法弟子圍繞。這種隔龕對坐的構圖方式與雲岡石窟第 35-1 窟西壁下層（圖 20）的表現異曲同工，應屬同一配置概念。

目前筆者僅發現兩例陝西北魏晚期的維摩詰經像。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的佛教造像碑（圖 27），上層爲佛傳，下層盃頂垂帳中，彌勒菩薩居中交腳而坐，主尊右側爲維摩詰，左側爲文殊菩薩，二者均面向主尊，作對談狀。有些學者認爲，這樣的組合彷彿彌勒在宣說《維摩詰經》，典出〈囑累品〉，¹⁴⁴ 該品提到釋迦佛對

144 石松日奈子，〈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爲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頁 16；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81；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爲中心〉，頁 161；項一峰，〈6 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爲例〉，頁 67。

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¹⁴⁵

西安博物院所藏的造像碑（圖 28），中央開一尖拱龕，龕中刻坐佛三尊像，主尊坐佛右手作施無畏印，呈說法狀。主龕右側屋形帷幕龕下為文殊正面而坐，左側屋形龕中維摩詰持麈尾，憑隱几，面向觀者兩腿前伸而坐，身側有一比丘侍立。值得注意的是其身後有三角形的背屏，尚見雲岡第二期窟的餘緒。

上述兩例的維摩詰經像構圖簡單，基本上採取隔龕對坐的配置方式，且形體較大，與雲岡石窟第 35-1 窟西壁下層（圖 20）的布局類似。

隨著維摩詰信仰的發展，甘肅地區也發現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圖像。甘肅華亭石拱寺石窟第 11 窟入口上方有一鋪維摩詰經像（圖 29），採隔龕對坐的方式表現，居中開一尖拱龕，內雕坐佛三尊像；右側帷帳龕中，維摩詰頭戴小冠，手執麈尾，扶几而坐，身前三身聽法比丘；左側帷帳龕中，文殊手持如意，扶几而坐，身前有兩身聽法比丘。在三龕的龕楣上方有一列聽法比丘。較為特殊的是，在維摩詰和文殊菩薩的身前都雕有起伏的山巒。永靖炳靈寺石窟第 128 窟正壁雕二佛並坐像及二脇侍菩薩，二佛頂部二小龕內分別雕維摩詰和文殊菩薩。¹⁴⁶ 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35 窟左壁龕龕外左側畫居於帳內的維摩詰，右側畫華蓋下坐束腰座的文殊，因畫面漫漶，是否還繪有其他內容已不可辨。¹⁴⁷ 除了石窟外，在碑像或石塔節上，也有數例，但基本上，這些作品的構圖都十分簡單，多採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對坐為主體的形式出現，如莊浪出土的卜氏造像塔、¹⁴⁸ 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33 窟 10 號造像碑下段左側上部（圖 30），推測為出自隴東地區的王龍生等造像碑¹⁴⁹ 等。這些作品的內容單純，無敘事元素，為維摩詰經像。值得注意的是甘肅的維摩詰經圖像都發現在隴東地區，從地緣關係來看，隴東的維摩詰經圖像當可

145（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下，〈囑累品〉，頁 557 上。

146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249。

147 張寶璽，〈麥積山石窟壁畫敘要〉，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194。

148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圖 142。

149 林樹中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 80。盧少珊推測此作可能出自隴東地區（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73），本人同意其看法。

能受到關中的影響。

北魏晚期，在維摩詰經像的基礎上，增加了〈不思議品〉、〈觀衆生品〉、〈香積佛品〉等內容，於 510 年代出現了維摩詰經變。不過此時維摩詰經像的數量遠遠超過維摩詰經變，同時維摩詰經像的分布甚廣，在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皆有發現，而維摩詰經變僅在山西和河南可以看到，說明當時維摩詰圖像的發展，仍以維摩詰經像爲主。在構圖方面，可以分爲隔龕或隔佛對坐、隔門對坐、維摩詰文殊對坐爲主體表現和維摩詰爲至尊四大類，在這四種形式中，以隔龕或隔佛對坐爲表現的大宗，維摩詰文殊對坐爲主體表現次之，隔門對坐僅有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圖 14）一例，維摩詰爲至尊的也只有山西南涅水石塔節（圖 24）一例。

2. 東、西魏

東、西魏時期，除了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外，在山東也發現了維摩詰經像。雖然河南的東魏與維摩詰經有關作品的數量，不能和北魏晚期相提並論，但在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史上，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北齊書》〈神武下〉載，東魏天平元年（534）孝靜帝決定遷都鄴城時，「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¹⁵⁰ 皇家貴族、宮廷官署、商賈平民、百工伎巧等大舉遷徙。此外，洛陽處於東、西魏兩大政權的爭奪地帶，爲當時的主要戰場，因此洛陽迅速衰弱，龍門石窟的營建遲緩，雖然在一些小型龕像的龕楣兩側或上方仍有維摩詰經像的發現，但東魏以來數量銳減。河南東魏的造像碑上仍可發現維摩詰經像和維摩詰經變兩類作品，東魏天平三年（536）比丘僧略等造釋迦牟尼七尊像殘碑，碑陰¹⁵¹ 浮雕一屋形龕，龕中有一禪定僧，右側文殊菩薩手持如意，半跏垂足而坐，左側的人物雖然大部分殘損，但從伸直的左腳以及榻下的一雙鞋來看，當爲維摩詰無疑，是一件維摩詰經像的作品。

筆者目前發現三件河南地區的東魏維摩詰經變。一爲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司徒永孫等造像碑，此碑碑陰上端，¹⁵² 右側雕帷帳下文殊菩薩右手持如意，在臺座上結跏趺坐，身側有衆弟子圍繞。左側雕帷帳下維摩詰右手持蒲扇形麈尾、左手

150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冊1,卷2,〈神武下〉,頁18。

151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8 reprint), vol. 1, pl. 177.

152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爲中心〉,圖8-1。

扶隱几坐於床榻之上，身側有眾侍女圍繞。在兩組人物之間，有一女子與比丘相向而立，當代表天女與舍利弗。另一為河南博物院藏武定元年（543）道俗九十人造像碑，¹⁵³ 碑額處雕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坐像，維摩詰身前有天女，文殊身前有一比丘，當為舍利弗。從構圖來看，以上兩例仍保留北魏晚期的餘韻。

在河南的東魏維摩詰經變中，最引人注目的應是原在河南淇縣浮山崇封寺的李道贊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此碑的碑額已殘，碑陽分為四層，最上層的龕內為坐佛五尊像；第二層為維摩詰經變（圖 31）；第三層分上下兩段，每段十格，每格均雕手執蓮花的供養人像和手持羽葆的侍者，其側有供養人題名。根據題名中的「維摩主輕車將軍勝州錄事參軍賀蘭思遠」，第二層維摩詰經變的供養人是賀蘭思遠。第四層為造像題記，題記末云：「維大魏永熙二年（533）歲在甲寅興建，至武定元年（543）歲次癸亥八月功就。」¹⁵⁴ 此碑雖然雕刻精美細緻，但不可能費時十年，故推測題記的紀年應是樹立此碑寺院的營造時間，¹⁵⁵ 這一造像碑當於武定元年大功告成。

此鋪維摩詰經變中央以兩棵樹將畫面分為兩大部分，右側雕文殊，左側雕維摩詰，二者相對而坐，其間穿插《維摩詰經》的故事細節。右側華蓋下，文殊頭有圓光，右手持如意，左手作施無畏印，坐於束腰座上。祂周圍圍繞著比丘、手持蓮花的供養人、頭戴小冠的文士、頭戴獸帽的人物等，代表與文殊同行、聽取文殊和維摩詰共談妙法的菩薩、弟子、釋梵、天王、天人等。右側的方室前有台階，室頂飾蓮花、如意寶珠等。方室中的維摩詰居士頭上戴冠，面有鬚髯，兩唇略張，情緒高亢地正在論談。身著寬袍大袖袍服，外披大氅，左手持蒲扇形塵尾，倚隱囊，悠閒地坐於一矮榻之上，身後有屏風。方室內外聽法群眾和比丘聚集。方室屋頂的後上方有一懸掛帷帳的方座，下有蓮台，座的左側尚見一獅子，右側有一天人乘雲而來，應是在描述〈不思議品〉維摩詰展現神通，向須彌燈王佛借獅子座的典故。屋頂的右上方尚見一手捧寶鉢自天乘雲飄然而下的菩薩，表示〈香積佛品〉化菩薩送香飯的場面。中央有兩棵樹，左側有一位頭束雙髻的天

153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東魏造像〉，圖錄 4，頁 160。

154 顏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 113。

155 Alan Priest,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reprint), 31; Denise Patry Leidy, "The Issue of the Trubner Stele," i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 Denise Patry Leidy and Donna Straha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10), 191.

女裊然而立，著束腰寬袖裙袍，右手執持花盤，左手橫展，作散花狀，其頭側有一飛舞的花朵。與其相對的比丘為舍利弗，衣上沾附花朵。舍利弗頭頂尚見一手持花盤的天人，乘雲而來，其上方尚見數朵在空中飛舞的花朵。此一畫面將〈觀眾生品〉的內容表現的鉅細靡遺，此品說：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¹⁵⁶

蓋此天女通達大乘佛理，借散花一事，因機設教，要舍利弗不要為無明所轉，破除分別心，則花自落的道理。這鋪維摩詰經變鴻篇巨製，在維摩詰和文殊論法的畫面中穿插〈不思議品〉、〈觀眾生品〉、〈香積佛品〉的故事情節，¹⁵⁷為一鋪內容豐富的經變畫。全作雕刻精緻華麗，布局緊湊和諧，人物姿態生動，線條流動明快，人物眾多而不雜亂，繪畫性強，是維摩詰經變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山西方面，太原天龍山石窟第3窟為一東魏時期開鑿的洞窟，窟口西南向，三壁三龕。西壁龕龕外南側自上而下原有淺浮雕文殊坐像（圖32-1），下部為二世俗供養人像。東壁龕龕外南側自上而下原有淺浮雕樹下思惟菩薩像、維摩詰像（圖32-2）和三身世俗供養人。二者雖不在入口兩側，但靠近且面向入口，配置方式仍見雲岡第7窟（圖6-1、6-2）的餘緒。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所藏東魏天平二年（535）的碑陽下方發現屋形龕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同榻對坐像。¹⁵⁸芝加哥美術學院博物館藏西魏大統十七年（551）造像碑最下層龕，主尊為坐佛九尊，最外側的兩尊為半跏思惟像，右側半跏思惟像上方雕手執塵尾的維摩詰，左側半跏

156（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觀眾生品〉，頁547下-548上。

157 秋山光夫和莊中都認為此鋪經變，以第五〈問疾品〉為主體，尚包括了第六〈不思議品〉、第七〈觀眾生品〉、第八〈佛道品〉、第九〈入不二法門品〉和第十〈香積佛品〉的內容（秋山光夫，〈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頁597；莊中，〈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下〉，《大陸雜誌》，頁284）。潘亮文則主張此鋪經變表現了〈問疾品〉、〈不思議品〉、〈觀眾生品〉、〈香積國品〉、〈弟子品〉與〈方便品〉（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頁149）。筆者的釋讀與上述諸學者略有出入。

158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版編，冊1，圖234a。

思惟像上方雕手持如意的文殊。¹⁵⁹ 沁縣南涅水出土的石塔節中，也發現東魏的維摩詰單身像。¹⁶⁰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的一佛教造像碑（圖 33），主龕中雕一坐佛、二脇侍菩薩和二脇侍弟子，佛龕兩側各雕面對主龕的螺髻人物一身。龕外兩側帳內，維摩詰手執麈尾和文殊菩薩手持如意相對而坐。

在此值得討論的是，此件造像碑佛龕兩側的螺髻像。金理那指出，一般稱為緣覺像（或辟支佛像）的螺髻像，當為梵王，由於出現這種脇侍人物的碑像上，大多發現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對坐的畫面，故很可能典出《維摩詰經》〈佛國品〉。¹⁶¹ 在此研究基礎上，有些學者甚至主張，凡出現以梵王為脇侍的多尊像，都有代表〈佛國品〉的意圖，¹⁶² 筆者對此看法不以為然。首先，這種螺髻脇侍像在一些北魏晚期的造像中亦有發現，有些作品固然雕有維摩詰和文殊像，但也有許多出現這類脇侍的造像上不見維摩詰經圖像，如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01、121、122 等以三世佛為題材的北魏窟，其正壁主尊的兩側，一側為比丘，一側即為螺髻像，但窟中皆未發現維摩詰經圖像。除此之外，到了北朝晚期，如原在嵩山少林寺武平二年（571）的佛教造像碑、北齊半跏思惟五尊像、北齊雙菩薩與四脇侍像¹⁶³ 等的脇侍都出現螺髻像，但碑中皆未刻維摩詰經圖像，所以作為脇侍的螺髻像是依《維摩詰經》〈佛國品〉所造一說，有待商榷。而且目前所見的螺髻梵王像（圖 18、19），其或著菩薩裝，或穿寬袖大袍，與脇侍螺髻像的造型相去甚遠，筆者認為這種螺髻脇侍像還是稱為「辟支佛」較為合適。又，縱使我們接受金理那的看法，認為螺髻像有代表梵王的可能，不過在《維摩詰經》中的螺髻梵王為一特定人物，而在多尊像組合中，皆成對出現，作為脇侍，其應代表眾梵王的觀念。大乘經典常提到，佛說法時，眾梵王與佛弟子、菩薩、長者子和其他大眾一起參與盛會，聆聽法義。換言之，就算出現「梵王」作為脇侍像的龕像，也不能說就一定與〈佛國品〉有關。所以筆者對脇侍螺髻像的出現即在表現〈佛國品〉內容的看法，並不贊同。

159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vol. 1, pl. 169A.

160 李靜杰，《石佛還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圖 161。

161 金理那著，洪起龍譯，〈關於 6 世紀中國七尊像中的螺髻像之研究〉，頁 73-77。

162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頁 68-69；曹德啓，〈北朝石窟中淨土與菩薩道信仰〉，頁 91-115；項一峰，〈6 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頁 72-73。

163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vol. 1, pl. 239B, 247B, 248A.

推測出自山西的西魏恭帝元年（554）薛山俱二百人造像碑，最上層雖殘（圖 34），但右側有一菩薩垂足坐，左側有一榻，其上原坐有一人，榻下有雙雲頭履和一隻臥著的小狗，榻側有二比丘合十跪地禮拜。從圖像特徵來看，此層當是一鋪維摩詰和文殊對坐圖。值得注意的是，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33 窟第 10 號北魏碑（圖 30），維摩詰的坐榻下也有一狗，只是該碑中，犬頭已殘。類似的表現在北齊、北周的維摩詰經像中仍有發現，足證其應有特定的涵意。茲查閱《維摩詰經》不見與犬狗相關的記載，項一峰指出，此圖像特徵的出現可能典出僧肇《注維摩詰經》〈囑累品〉注疏中的「死狗因緣故事」，¹⁶⁴ 這一說法值得參考。

目前筆者僅發現兩例陝西西魏的維摩詰經圖像，一為西安未央區出土的大統三年（537）法和造像碑（圖 35），此碑分上下兩層，上層屋形龕下，文殊在右、維摩詰在左，八分面相向跏坐，文殊身後有一侍者，維摩詰身後有二侍者。二者身後有一圍屏，屏後有三人，文殊和維摩詰身前各有五身弟子跪坐聽法。弟子中間有一力士，上舉一對蓮座，座上各立一人，似合捧一大蓮臺，人物眾多，但仍不脫維摩詰和文殊對談的場景。另一件為藥王山博物館所藏大統十二年（546）任安保六十人造像碑，據考古簡報，此碑碑陽下面有包括釋迦涅槃變、爭分佛舍利和維摩詰經變等畫面，¹⁶⁵ 由於簡報描述簡單，又未發表圖片，其具體內容不得而知。

在甘肅方面，原在莊浪縣良邑鄉寶泉寺的石塔節¹⁶⁶和董汝玉造像碑¹⁶⁷都為西魏之作，其上皆有維摩詰經圖像的發現。二者均採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對坐的形式，董汝玉造像碑在二者之間還出現聽法的弟子數身，構圖與王龍生造像碑極為近似。西魏時期所開鑿的天水麥積山第 102、123 窟為一西魏窟，正壁皆為坐佛三尊像（圖 36-1），右壁為文殊菩薩三尊像（圖 36-2），左壁為維摩詰三尊像（圖 36-3），在這兩窟中，文殊菩薩和維摩詰已變成主要禮拜的對象，凸顯了維摩詰經像的主體性，反映了當時維摩詰信仰在該地受到重視的程度。

在天水麥積山的西魏窟中，最重要的當屬第 127 窟，此窟不但規模宏偉，且內容豐富。第 127 窟窟內平面呈橫長方形，盞形頂，東壁上方畫維摩詰經變（圖 37），右側中後部殘損嚴重。右側畫一方帳，帳中維摩詰下半身已殘，身後有折

164 項一峰，〈6 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頁 67-69。

165 陝西省文物普查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1994 年 2 期，頁 46。

166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92。

167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圖 16。

屏。方帳右前方有一樹，樹下有一人持障扇，方帳左側兩棵樹下有兩列頭戴小冠、身著寬袖大袍的聽法信眾。正中大樹下立一天女，著曳地長裙，天衣繞臂向後飛揚，左手捧一花盤，右手上揚作散花狀。與之相對的兩棵樹下，畫九身弟子和兩列菩薩，最前端一身弟子形體較其他弟子略顯高大，當為舍利弗，此應是描繪〈觀眾生品〉天女向弟子與菩薩散花，並與舍利弗論法的畫面。在眾人腳下地面，尚可見一朵朵石青色花卉。左側懸垂飄帶的華蓋下文殊手持如意，坐於須彌座上。文殊後側的樹下繪三列菩薩，左側有三棵樹，前兩棵樹下繪三排弟子和菩薩，其後為國王夫婦及侍從，其中國王頭戴籠冠，頭略上仰，雙臂展開。簇擁的侍者中，兩侍者手持障扇，二侍者手持羽葆。此景當在表現〈方便品〉的國王、大臣、居士等前往問疾，聆聽維摩詰開示的情節。此作構圖宏偉，人物眾多，除了維摩詰和文殊論法外，尚包括了〈觀眾生品〉、〈方便品〉的情節，¹⁶⁸ 為一鋪發展成熟的大型維摩詰經變。

由於麥積山第 127 窟的維摩詰經變和甘肅北魏、西魏維摩詰經圖像構圖意念大不相同，說明其粉本或工匠當來自外地。學者的研究指出，第 127 窟很可能是武都王元戊為母乙弗后（510-540）建造的功德窟。¹⁶⁹ 乙弗后洛陽人，為西魏文帝（507-551；535-551 在位）的皇后，二人情感篤厚，然因政治壓力，文帝不得不廢黜乙弗后，另娶柔然可汗阿那瓌的女兒為皇后。乙弗后被廢後，出家為尼。後其子武都王元戊被任命為秦州刺史，乙弗廢后隨子赴秦州，最後被迫自盡於麥積山，文帝為她在麥積山修建了寢陵，即學界公認的第 43 窟。由於武都王元戊和乙弗廢后皆來自長安，所以學者推測，127 窟維摩詰經變的粉本很可能直接來自長

168 對此鋪維摩詰經變所反映的內容，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張寶璽認為主要表現了〈問疾品〉、〈觀眾生品〉和〈方便品〉的相關內容（張寶璽，〈麥積山石窟壁畫敘要〉，頁 193）。孫曉峰認為除了上述諸品外，從畫面的線索來推測，可能還有〈弟子品〉和〈不思議品〉燈王借座的內容，不過理由尚不十分充分（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頁 187-188）。吳茲、魏文斌主張，畫面中的國王、眷屬等表現了〈法供養品〉中的聽法供養人，故包括了〈問疾品〉、〈觀眾生品〉和〈法供養品〉（吳茲、魏文斌，〈甘肅中東部石窟早期經變及佛教故事題材考述〉，頁 20）。此外，項一峰認為帳中的人物乃文殊菩薩、坐於華蓋下的乃維摩詰，該鋪經變包括了〈問疾品〉、〈方便品〉、〈香積佛品〉和〈見阿閼佛品〉（項一峰，〈《維摩詰經》與維摩詰經變——麥積山 127 窟維摩詰經變壁畫試探〉，《敦煌學輯刊》，1998 年 2 期，頁 97-101）。不過項一峰的釋讀多有錯誤，孫曉峰已仔細說明，參見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頁 182-186。

169 金維諾，〈麥積山石窟的興建及其藝術成就〉，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頁 173；鄭炳林、沙武田，〈麥積山第 127 窟為乙弗皇后功德窟試論〉，《考古與文物》，2006 年 4 期，頁 77。

安，甚至於直接由長安來的畫工所繪。¹⁷⁰

孫曉峰指出，麥積山第 127 窟的七佛圖在佛、菩薩、弟子的形象、著裝和構圖技巧、背景樹木等方面，都和洛陽城東出土的北魏正光五年（524）劉根造像碑正中線刻的釋迦說法圖十分相似，認為這鋪七佛圖的粉本來自洛陽地區。¹⁷¹仔細觀察麥積山第 127 窟維摩詰經變，畫面背景出現樹木、維摩詰方形帷帳頂飾寶珠、文殊寶帳懸掛飄帶、天女手捧圓盤和衣帶飛舞的造型等，也都與河南大場面的維摩詰經變（圖 18、31）彷彿，顯示二者關係密切。西魏文帝和乙弗后皆為洛陽人，在他們自洛陽西遷長安的過程中，除了親眷家屬、臣子官員外，很可能也帶了一些百工巧匠，將洛陽的藝術傳統帶到長安。也就是說，考量乙弗后的背景，筆者以為即使如學者所言，127 窟維摩詰經變的粉本很可能直接來自長安，甚至於直接由長安來的畫工所繪，但這些畫工可能根據的是洛陽寺院壁畫的粉本，或者這鋪壁畫就是自洛陽遷徙到長安的畫工所為。

東平出土的武定年間（543-550）佛教造像碑，是筆者所知最早的一件山東雕有維摩詰經圖像的作品，也是唯一一件山東東魏的維摩詰經圖像。此碑正面分三層，第一層為坐佛三尊像；第二層（圖 38）中央為一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的立佛，立佛的右側帷帳下為手執麈尾、扶几而坐的維摩詰像，左側帷帳下為手持如意的文殊菩薩，是採隔佛對坐配置方式的維摩詰經像。最下層為二獅子和二天王。

東、西魏時，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山東皆有維摩詰經圖像的發現，不過仍以維摩詰和文殊對坐，不表現《維摩詰經》故事情節的維摩詰經像為主流，僅在河南和甘肅有維摩詰經變的發現。由於甘肅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的維摩詰經變與當地北魏的傳統並無傳承關係，考量到乙弗后的背景，推測可能受到長安的影響，但其粉本祖源可能來自洛陽。在構圖方式上，可分為隔龕或隔佛對坐、隔門對坐、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表現和維摩詰單身像四大類。在這四種形式中，隔龕或隔佛對坐的數量最多，但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的表現有增加的趨勢，隔門對坐僅有天龍山第 3 窟一例，維摩詰單身像僅在山西沁縣南涅水石塔節上發現的一例。

170 東山健吾，〈麥積山石窟の草創と仏像の流れ〉，收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協會、日本經濟新社，〈中国麥積山石窟展〉（東京：日本經濟新社，1992），頁 20；八木春生著，李梅譯，〈天水麥積山石窟編年論〉，《石窟寺研究》，2 輯（2011.12），頁 125；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頁 51；鄭炳林、沙武田，〈麥積山第 127 窟為乙弗皇后功德窟試論〉，頁 79。

171 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頁 390-391。

3. 北齊、北周

北齊、北周時期，河南的維摩詰經像的數量最多，河南維摩詰信仰之盛行可見一斑。鑿造於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5）的安陽小南海中窟，窟門內側上方浮雕一鋪維摩詰經變，可惜臉部全遭破壞。文殊和維摩詰側身相向而坐（圖 39），左側文殊左手持如意，結跏趺坐；右側為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左手扶隱几而坐。二者之間有一天女，面向文殊，兩臂外展，右手持花。緊貼文殊背後、拱手站立的比丘，應該就是舍利弗。文殊身後有十五身或持蓮花、或持經卷的比丘，以及兩位俗裝的供養人。維摩詰的屏風後面有兩列僧俗人物，手持蓮花的俗裝供養人頭束花髻，作婦女形象。

根據王景荃的調查，河南北齊、北周單獨的石刻造像有四十四件，其中九件刻有維摩詰經圖像，占全數的幾乎五分之一。在西方博物館的收藏中筆者尚發現三件，¹⁷² 還有一件河清二年（563）上官僧度等造像碑，¹⁷³ 雖是安徽亳縣咸平寺舊址出土，而亳縣鄰近河南，碑像的樣式亦與河南造像碑彷彿，故可視為河南一系的作品。依筆者所收的十三件河南北齊維摩詰經圖像的作品，其構圖方式可以分為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表現、隔龕對坐和維摩詰為主尊三大類。

十三件中，以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表現的數量最多，計九件。天保二年（551）坐佛九尊像造像碑的龕額浮雕維摩詰經變（圖 40），右側華蓋下文殊右手持如意，結跏趺坐，右側有五身弟子，左側有一身弟子。左側帳中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左手扶几，坐於方榻上，身後有一弟子，帳外有二侍女。文殊與維摩詰之間，刻一獅子馱著方座，上方有二天人手捧飯鉢，表現〈不思議品〉燈王借座和〈香積佛品〉化菩薩送香飯的內容。天保十年（559）高海亮等造像碑的主龕上方（圖 41），右側的圓形帷帳內，文殊右手作施無畏印，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左右各有一侍女；左側的方形帳內，維摩詰右手持麈尾，遊戲坐於榻上，鞋置於榻下，帳前有一侍女。兩帳之間的人物分為兩排，下排為四比丘，上排為一立佛與二脇侍菩薩和一擊鐘的比丘，具體內容待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擊鐘比丘唯發現於河南的北齊維摩詰經圖像之中，如洛陽古代藝術館藏天保五年（554）趙慶祖

172 這三件為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坐佛九尊像造像碑（見本文圖 40）、北齊河清三年道政四十八等造像碑（見本文圖 43），和瑞士瑞特保格博物館藏北齊坐七尊像造像碑（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佛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圖 34。）

173 林樹中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 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 122。

等造像碑、¹⁷⁴ 洛陽古代藝術館藏洛陽四面造像碑（圖 42）等，但在其他地區不會看到，應是河南的區域特色。有趣的是，和西魏恭帝元年（554）薛山俱二百人造像碑（圖 34）一樣，洛陽四面造像碑的維摩詰榻下，也伏臥著一隻狗，說明此狗的出現應有其宗教意義。除上述諸例外，以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表現的河南北齊作品尚包括了天保八年（557）法陰等造像碑、¹⁷⁵ 河清二年（563）上官僧度等造像碑、武平三年（572）佛時寺四面造像碑、¹⁷⁶ 原存沁陽市馮橋村興隆寺四面造像碑、¹⁷⁷ 禹州出土的陳光等四面造像碑。¹⁷⁸

隔龕對坐的例子計三件。天保八年（557）劉碑寺造像碑¹⁷⁹ 碑身縱向分三列雕刻，中間上層為半跏思惟菩薩龕，下層為坐佛五尊龕，龕外兩側各有一辟支佛；右列上層和中層均是坐佛五尊像龕，下層為文殊龕；左列上層和中層均是坐佛五尊像龕，下層為維摩詰龕。維摩詰和文殊隔著中間的坐佛五尊龕，對坐說法。河清三年（564）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碑的最上層（圖 43），中間為一坐佛五尊，右側文殊左手持如意，右手扶几，坐於蓮花座上，左側維摩詰手持麈尾，身倚隱囊自在舒坐。佛龕右側上方有一捧飯鉢的菩薩，左側上方有一捧寶臺的飛天，表現〈香積佛品〉和〈不思議品〉的情節。約雕於天統三至五年（567-569）的崔永仙造像碑的上層（圖 44）中間為一坐佛三尊龕，右側方帳內為維摩詰，身前立一天女，左側帳內為文殊，身側有一比丘，可能為舍利弗。在維摩詰和文殊的寶帳上方各有一身捧鉢的天人，當代表〈香積佛品〉的送香飯菩薩。

另外，新市縣千唐志齋博物館藏的一件佛教造像碑，碑左側自上而下雕三龕，上層為交腳彌勒三尊像；中層為維摩詰龕，帳形龕中的維摩詰頭部已殘，手握麈尾，倚隱囊側身支右腿悠閒而坐，左右各有一弟子袖手而立；下層為立佛五尊像。碑右側也雕三龕，上層為半跏思惟菩薩像龕，中層為坐佛五尊像龕，下層為立佛三尊像龕。¹⁸⁰ 由此看來，該碑碑側的圖像各自獨立，故此碑的維摩詰龕為一以維摩詰為主尊的龕像，是目前筆者所知唯一一件河南維摩詰單獨造像。

174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3，頁 190。

17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佛像》，圖 34。

176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22，頁 279。

177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21，頁 272、頁 274。

178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30，頁 315。

179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6，頁 201。

180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33，頁 330-332。

在山西方面，筆者發現三件北齊、北周刻有維摩詰經圖像的作品。一件為運城解州鎮徵集的北周保定二年（562）衛秦王等造四面像碑，此碑碑陽分二層，上層龕（圖 45）中雕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七尊像，背光右側上方雕文殊扶几而坐，左側上方雕維摩詰扶几而坐。山西省藝術博物館藏北周保定二年樹延和等七百人造像碑，碑陰最下層的龕內雕一結跏趺坐佛、二弟子、四菩薩七尊像，並在左上角刻維摩詰，右上角刻文殊。¹⁸¹ 這兩件維摩詰經圖像的構圖皆十分簡單。原在山西太原天龍山的北齊武平六年（575）佛教造像碑，碑陰分三層，最上層樹形龕下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和二辟支佛；中層（圖 46）帳形龕內右側雕文殊手持如意，結跏趺坐於矮榻上，左側雕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左手扶隱几，坐於須彌座上，二者之間有三排聽法比丘；下層為二佛並坐龕，左右各有一脇侍弟子和菩薩。這三例的內容單純，皆為維摩詰經像。

陝西長武縣出土的北周天和三年（568）的佛教造像殘碑，是目前筆者所知唯一一件陝西北周時期刻有維摩詰經圖像的作品。此碑現存兩層，下層（圖 47）右側帳形龕內，維摩詰手持麈尾，背靠隱囊，悠然自在而坐，身後有一身比丘，屏風後尚雕二身比丘；左側華蓋下，文殊垂足倚坐，身後有二身比丘，在二者的身後各開二個坐佛小龕，是以維摩詰和文殊作為主體的維摩詰經像。

甘肅地區發現五件刻有維摩詰經圖像的造像碑。涇川博物館藏北周武成二年（560）張代李石造像殘碑，現存最上兩層，第一層為二佛並坐龕，第二層（圖 48）是維摩詰經變。右側帳形龕中維摩詰手持麈尾跌坐在矮榻上，身後有一侍女與比丘對談。¹⁸² 左側華蓋下文殊菩薩右手持如意，半跏垂足坐於須彌座上。在文殊的華蓋和維摩詰的方帳間有一天人手捧一物，參考涇川大雲寺遺址出土的北周庚辰年（560）法起造像碑¹⁸³（圖 49），二者天人的形象和布局相似，此天人手中執持的應為圓鉢，當代表〈香積佛品〉化菩薩送香飯的情節。張代李石造像殘碑

181 李靜杰，《石佛選粹》，頁 211。

182 項一峰認為此景可能與〈觀眾生品〉中所說：「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還復如故」等內容有關（項一峰，〈6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頁 70）。不過，依據維摩詰經變與〈觀眾生品〉有關的場面，天女與舍利弗多出前在維摩詰和文殊之間，與此作的表現頗有出入，故筆者不認同項一峰的對這兩位人物的解讀。

183 此碑題記的第一行上數字殘損，僅見「次庚辰」。魏文斌和吳茲認為，此碑的造像特點與華亭縣出土的北周保定四年（564）造像碑十分接近，兩者年代應相近。北周有「庚辰」紀年的為明帝武成二年（560），見魏文斌、吳茲，〈涇川大雲寺遺址新出土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5期，頁 75。

文殊的身後，有三比丘，最右側刻一雙髻天人，兩手上舉須彌座，乃刻畫〈不思議品〉燈王借座的情節。類似的作品尚有甘肅博物館藏祿文等造像碑。¹⁸⁴另外尚值一提的是，比丘法起造像碑中，維摩詰的榻下也臥伏著一隻小狗，類似的表現在涇川博物館所藏的北周庚辰年（560）佛教造像碑¹⁸⁵上亦有發現。除了上述四例外，尚有一件秦安新化鄉任吳村徵集的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此碑碑陰佛龕內雕一佛二弟子（圖 50），右側華蓋下文殊左手持如意，半跏垂足而坐；左側屋形龕內維摩詰右手持麈尾，垂足而坐。二者皆面向主龕，仍見了北魏晚期的餘緒。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例的出土地均在接近關中的隴東地區，推測與關中佛教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

目前山東地區僅收得三件北齊刻具維摩詰經圖像的作品。博興興益村發現的坐佛七尊像（圖 51），中央為一坐佛，兩側各有一比丘、辟支佛和菩薩為脇侍。頭光上雕交纏的雙樹，上層有九片樹葉，各刻一幅佛教故事畫。在兩脇侍菩薩的頭部上方，右側雕文殊菩薩手倚隱几而坐，左側雕維摩詰背靠隱囊而坐。臨朐出土的北齊立佛三尊像，右脇侍菩薩左上方有維摩詰小殘像，其蓮座右下角刻「維摩主孫祖」。¹⁸⁶另外，據李靜杰的調查，臨沂一北齊塔式造像碑碑陽開龕，龕內雕一坐佛和二脇侍菩薩。「額部上方中央置摩尼珠，珠左側為乘象普賢（誤刻，應為騎獅文殊），右側為維摩詰。」¹⁸⁷整體而言，北齊時，山東地區維摩詰經圖像均出現主像上方的兩側，形體小，其重要性較不顯著。

北齊、北周時，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山東共發現二十六件的維摩詰圖像，包括了十七件維摩詰經像，九件維摩詰經變，顯然維摩詰經像仍為主流。在構圖方式上，可分為隔龕或隔佛對坐、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表現和維摩詰為主尊三大類。在這三種形式中，維摩詰文殊對坐為主體之例計十四件，且在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等地皆可看到，顯示這種構圖方式漸趨普遍。隔龕或隔佛對坐

184 張寶靈，《甘肅佛教石刻造像》，圖 168、頁 213。此作無紀年，張寶靈認為此作北魏之作，然其此作的造像特徵與張代李石造像碑近似，故筆者認為此碑應是北周之作。

185 魏文斌、吳茲，〈涇川大雲寺遺址新出土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圖 4；項一峰，〈6 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圖 8。魏文斌、吳茲認為此碑乃北周之作，而項一峰則認為其為北魏景明元年（500 年，歲次庚辰）之作。由於主龕坐佛肉髻低平，面方頸短，身體較為粗壯，與北周造像的風格特徵相符，故本人同意魏文斌和吳茲對此碑的斷代。

186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圖 37、頁 166。

187 李靜杰，《石佛選粹》，頁 214。

者有九例，以維摩詰為單身像者僅有一例，刻在河南新市縣千唐志齋博物館所藏的一件佛教造像碑上。

四、結論

自晉到南北朝，許多僧俗研習、誦持、講述《維摩詰經》，義學沙門、士人名流，甚至皇帝都為此經作義疏，《維摩詰經》已成為當時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維摩詰信仰盛行。然而由於南、北文化不同，在維摩詰經像的發展上，兩地也各有偏重。因為《維摩詰經》中大量的名理辯難與南方名士玄談的表現一致，而維摩詰辯才無礙，游戲神通，又是兩晉、南朝清談名士崇拜的偶像，其儀度風範、談吐舉止更是南朝貴族、名士競相模仿的對象。依據畫史與僧傳的記載，雖然南朝已有維摩詰經變的出現，但維摩詰的單身像較為流行，兩晉、南朝重要的畫家，如張墨、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等都曾畫單獨的維摩詰像。然而從北朝存留大批維摩詰經圖像來看，僅發現三例維摩詰單身像，維摩詰、文殊對坐像的表現極為普遍。維摩詰、文殊對坐像早在五世紀二〇年代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第 24 號壁畫即已出現，現存北魏中期五例的維摩詰經像也都採取這樣的表現方式。自此以來，這種形式已成為北方維摩詰經圖像的重要表徵，一直到北齊、北周，盛行不衰，為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的基本結構。

依據文獻資料，早在三、四世紀時，南方即有維摩詰像的製作，然而這些維摩詰像多為居士造型。可是，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第 10 號、11 號壁畫的維摩詰像皆作菩薩裝，北魏中期四例維摩經像的維摩詰像又著胡服，在圖像上，這些北方早期的維摩詰經像顯然與南方傳統大異其趣，顯示在中國早期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上，南、北兩地獨立發展。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以後，積極推行漢化政策，並吸收南朝文化養分。在南朝文化的影響下，身著漢服，秀骨清相，前憑隱几，或後靠隱囊，姿勢自在不羈的維摩詰像始大量出現，奠定了六世紀北方維摩詰圖像的基礎。同時，隨著南、北文化的交流，流行於北方的維摩詰、文殊對坐像也影響到了南朝的佛教造像，四川成都市西安路出土蕭梁背屏式造像背面維摩詰經圖像的祖源，很可能即來自北朝。

北朝維摩詰經圖像分布於甘肅東部、陝西、山西、河南、河北與山東。其中，甘肅東部出現的最早，早在五世紀二〇年代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即有發現，但自

此以後，中斷了數十年，直到北魏晚期才再出現，自此一直到北周代有雕造。山西延續的時間最長，北魏中期雲岡石窟就有維摩詰經圖像的刻造，一直延續到北齊、北周，未曾中斷。河南地區，維摩詰經圖像的遺存最多，始於北魏晚期，以迄北齊，延續不斷。潘亮文指出，根據作品出土地或現存狀況來看，其流行於河南各地。¹⁸⁸ 其中更不乏義邑造像，此一現象可以說明河南維摩詰信仰流傳普遍。五世紀初，關中已是維摩詰信仰的中心，但陝西現存的北朝維摩詰經圖像作品數量不多，筆者僅發現北魏晚期二例，西魏兩例和北周一例。令人好奇的是，在北朝晚期受關中文化影響的隴東地區卻發現不少維摩詰經圖像。由此看來，現存的陝西維摩詰經圖像，恐不足以反映該地的維摩詰信仰面貌。河北地區雖然在北魏中期便有維摩詰經像的製作，可是除了五世紀七〇年代的兩件外，迄今尚未發現其他河北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然而根據文獻，北齊時為《維摩詰經》作疏的慧順、僧範、慧光都曾在鄴都（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活動，北齊天統四年（568）左右在邯鄲北響堂石窟南洞的刻經中也有《維摩詰經》的鑿刻，表示北齊時河北應仍有維摩詰信仰的流傳，只是在造像上，似乎這個題材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潘亮文認為河北的作品可能受到山西大同的影響。¹⁸⁹ 不過由於現存兩件河北作品皆為五世紀七〇年代之作，與雲岡最早的第7窟維摩詰經像年代相近，且這兩件作品中的維摩詰皆為跏坐，與北魏中期雲岡石窟的維摩詰都採倚坐像有別，所以筆者不同意潘亮文之說。山東地區直到東魏時才有維摩詰經圖像的雕造，目前筆者僅發現一件東魏作品，三件北齊之作，數量稀少。這些作品皆為隔龕或隔佛構圖形式的維摩詰經像，維摩詰、文殊所佔的幅面很小，所以推測，維摩詰信仰在山東的發展似乎較為遲緩。

檢視北朝維摩詰經圖像的發展歷程，北魏中期出現的維摩詰與文殊隔龕對坐、隔佛對坐、隔門對坐，以及以維摩詰和文殊對坐為主體這四種構圖方式，奠定了北朝維摩詰經像的構圖基礎。整體而言，北朝維摩詰經圖像以表現簡單隔龕和隔佛對坐的數量最多，分布的地區也最廣，在甘肅東部、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東都有發現，應為北朝維摩詰經圖像構圖的主流。其次為維摩詰和文殊對坐為主體性的表現，見於甘肅東部、陝西、山西和河南。北齊、北周時，維摩詰和文殊對坐為主體的表現形式更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至於隔門對坐式，僅出現

188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頁171。

189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頁171。

在石窟之中，目前僅見於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和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北朝維摩詰經變是在維摩詰經像的基礎上，增加了《維摩詰經》諸品中的敘事情節，演變而生。這樣的作品只見於河南、山西和隴東，在陝西、河北和山東皆沒有北朝維摩詰經變的發現。六世紀一〇年代賓陽中洞除了浮雕維摩詰、文殊隔門對坐像外，又增刻了〈觀衆生品〉的天女和舍利弗以及〈不思議品〉的燈王借坐的情節，是現存較早的維摩詰經變遺例，也是維摩詰經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自此以後至北齊，河南地區一直有維摩詰經變的雕鑿。山西僅出現在北魏中、晚期，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則不再出現。甘肅東部則始自西魏，到了北周仍有所見。足證，維摩詰經變在北朝各地發展的時間不一。

在維摩詰經變表現的上，河南、山西和隴東亦有出入。河南地區北魏晚期出現了〈佛國品〉、〈方便品〉、〈文殊師利問疾品〉、〈觀衆生品〉、〈不思議品〉、〈香積佛品〉的情節，內容最爲豐富。山西北魏的造像中，發現了〈觀衆生品〉和〈香積佛品〉的場景，¹⁹⁰甘肅天水麥積山第127窟的西魏壁畫則加入了〈方便品〉和〈觀衆生品〉的內容，甘肅東部北周的作品裡鑿刻了〈不思議品〉和〈香積佛品〉的畫面。其中，〈觀衆生品〉皆以對立的天女和舍利弗爲代表，〈香積佛品〉則以在空中飛翔的捧鉢菩薩爲表徵，三地的表現形式類似，而〈不可思議品〉燈王借坐的表現手法則十分多元。在河南方面，賓陽中洞的獅子座下有蓮台的方座，座上立柱設帳，自空中飛來，類似的手法亦見於武定元年李道贊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永熙二年趙見禧等造立佛三尊像碑不見獅子座飛來的畫面，反而刻畫菩薩登獅子座，弟子不能昇座的場景。賓州大學博物館藏天保二年坐佛九尊像造像碑的獅子馱著上有方帳的方座則出現在維摩詰和文殊之間。河清三年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碑則以空中天人手捧須彌座爲代表。表現手法最爲多樣，最具實驗精神。在隴東地區，北周作品中的燈王借座則以文殊菩薩身後有一天人雙手上捧須彌臺來代表，在構圖上與河南作品不類。顯然，在維摩詰經變的表現上，各地各具特色，各有不同的區域性發展。

190 趙昆雨認爲，北魏雲岡石窟出現〈佛國品〉、〈文殊師利問疾品〉、〈觀衆生品〉、〈香積佛品〉、〈菩薩行品〉等題材（趙昆雨，〈雲岡石窟維摩詰圖像研究〉，頁44-51），然而筆者認爲其對一些作品的釋讀不當，故主張山西北魏的維摩詰經變，僅在維摩詰經像的基礎上，加上了〈觀衆生品〉和〈香積佛品〉的內容。

北魏末至東魏，河南地區出現的大場面的維摩詰經變，如孝昌三年蔣伯仙造像碑、武定元年李道贊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情節增多，富空間感，繪畫性強，具濃厚的河南地方特色。這種樣式的維摩詰經變隨著平城和洛陽兩地的頻繁往來，影響到了平城，北魏晚期雲岡第 32-10 窟外壁也發現了一鋪類似的作品，不

過此為山西地區的孤例，除此之外，山西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例證，說明洛陽傳來的粉本並未在山西紮根。此外，上文所述麥積山第 127 窟的粉本祖原可能來自河南的洛陽，然而麥積山第 127 窟的壁畫風格特殊，為一麥積山石窟北朝窟中的特例，產生的背景極可能與乙弗后及其家人來自洛陽有關。除此窟之外，西魏、北周的的麥積山洞窟中均不見具洛陽壁畫風格的作品。上述這些跡象表明，河南大場面的維摩詰經變具地方特色，北朝時對其他地區並未產生太大的影響力。

〔後記〕承蒙匿名審查人細心指正，謹此致謝。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北齊) 顏之推著，蔡宗陽校注，《新編顏氏家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北齊)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入中國書畫研究資料社編，《畫史叢書》，冊 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 (唐) 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 (唐)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清) 董誥等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
- (清) 端方，《陶齋藏石記》，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冊 1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 高楠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 (吳) 支謙譯，《維摩詰經》，收入《大正藏》，冊 14，T. No. 474。
- (後秦)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收入《大正藏》，冊 14，T. No. 475。
- (後秦) 僧肇選，《注維摩詰經》，收入《大正藏》，冊 38，T. No. 1775。
- (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收入《大正藏》，冊 55，T. No. 2145。
- (梁) 慧皎，《高僧傳》，收入《大正藏》，冊 50，T. No. 2059。
- (梁) 寶唱，《比丘尼傳》，收入《大正藏》，冊 50，T. No. 2063。
- (唐) 法琳，《辯正論》，收入《大正藏》，冊 52，T. No. 2110。
- (唐) 道宣，《廣弘明集》，收入《大正藏》，冊 52，T. No. 2103。
- (唐) 道宣，《續高僧傳》，收入《大正藏》，冊 50，T. No. 2060。
- 佚名，《惠遠外傳》，收入《大正藏》，冊 85，T. No. 2859。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近人論著

- 八木春生著，李梅譯，〈天水麥積山石窟編年論〉，《石窟寺研究》，2 輯，2011 年 12 月，頁 111-137。

- 于向東，〈6世紀前期北方地區維摩詰經變的演變——兼論與南朝佛教圖像的關聯〉，《藝術設計研究》，2016年4期，頁11-17。
- 天水麥積山石窟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
-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白化文，〈麈尾與魏晉名士清談〉，《文史知識》，1982年7期，頁79-82。
- 石松日奈子，〈維摩和文殊造像的研究——作為中國南北朝時期佛教藝術中左右對置表現的一個例子〉，收入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9-22。
- 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譯，《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因幡聰美著，胡皓然、劉軍淼譯，〈關於雲岡石窟第7、8窟中設計性的考察〉，《石窟寺研究》，9輯，2019年6月，頁58-92。
- 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
- 吳葦、魏文斌，〈甘肅中東部石窟早期經變及佛教故事題材考述〉，《敦煌研究》，2002年3期，頁19-25。
-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11卷4期（1994夏），頁1-80。
- 李靜杰，《石佛選粹》，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
- 肖建軍，〈中國早期維摩詰變相的創造與展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9期，頁131-145。
- 林樹中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 金申，〈易縣北魏交腳菩薩像造型上的幾個問題〉，《文物》，1997年7期，頁61-63。
- 金理那著，洪起龍譯，〈關於6世紀中國七尊像中的螺髻像之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2期，頁72-79。
- 金維諾，〈敦煌晚期的《維摩變》〉，《文物》，1959年4期，頁54-60，後收入金維諾，《中國美術史論集》，中卷，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4，頁202-211。
- 金維諾，〈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發展〉，《文物》，1959年第4期，頁3-8，後收入金維諾，《中國美術史論集》（更名為〈壁畫《維摩變》的發展〉），中卷，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4，頁193-201。

- 金維諾，〈麥積山石窟的興建及其藝術成就〉，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165-180。
- 范子燁，〈六朝名僧與塵尾風流〉，《文史知識》，2017 年 3 期，頁 72-79。
- 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 127 窟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
- 陝西省文物普查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1994 年 2 期，頁 45-58。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佛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 宿白，〈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225-239。
- 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114-144。
- 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收入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76-88。
- 張乃翥，〈龍門石窟維摩變造像及其意義〉，《中原文物》，1982 年 3 期，頁 40-45。
- 張華，〈雲岡石窟中維摩詰和文殊菩薩造像的探討〉，收入雲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 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239-250。
- 張寶璽，〈麥積山石窟壁畫敘要〉，收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190-200。
- 張寶璽，《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 曹德啓，〈北朝石窟中淨土與菩薩道信仰〉，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18。
- 莊申，〈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上〉，《大陸雜誌》，17 卷 8 期，1958 年 10 月，頁 246-248。
- 莊申，〈北魏石刻維摩變相圖考—下〉，《大陸雜誌》，17 卷 9 期，1958 年 11 月，頁 284-288。
- 揚之水，〈丹枕與綉縵〉，收入揚之水，《曾有西風半點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 108-138。
-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敦煌研究》，1983 年試刊 2 號，頁 62-87，後收入賀世哲，《敦煌石窟論稿》，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頁 225-282。
- 賀世哲，〈維摩詰經變〉，收入賀世哲，《敦煌石窟全集 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181-197。
- 項一峰，〈《維摩詰經》與維摩詰經變——麥積山 127 窟維摩詰經變壁畫試探〉，《敦煌學輯刊》，1998 年 2 期，頁 94-102。

- 項一峰，〈6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為例〉，《石窟寺研究》，10輯，2020年6月，頁54-75。
- 溫玉成，〈龍門北朝小龕的類型、分期與排年〉，收入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170-224。
- 溫玉成，〈古陽洞研究〉，收入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研究論文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143-212。
- 董玉祥主編，《炳靈寺一六九窟》，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
- 鄒清泉，〈虎頭金粟影：維摩畫像研究獻疑〉，《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4期，頁129-139。
- 鄒清泉，《虎頭金粟影——維摩詰變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雷玉華，〈四川南北朝造像的分期及淵源諸問題〉，收入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10-227。
- 趙昆雨，〈雲岡石窟維摩詰圖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7期，頁39-53。
- 劉景龍編著，《蓮花洞——龍門石窟第712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 潘亮文，〈敦煌隋唐時期的維摩詰經變作品試析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義〉，《佛光學報》，新1卷2期，2015年7月，頁535-584。
- 潘亮文，〈北朝時期的維摩詰經美術研究——以單體造像作品為中心〉，《佛光學報》，4卷2期，2018年7月，頁137-202。
- 鄭炳林、沙武田，〈麥積山第127窟為乙弗皇后功德窟試論〉，《考古與文物》，2006年4期，頁76-85。
- 盧少珊，〈北朝隋代維摩詰經圖像的表現形式與表述思想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1期，頁64-96。
- 蕭玉真，〈中國維摩造像的起源與開展——以隋唐敦煌維摩變壁畫為研究重心〉，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碩士論文，1999。
- 霍巍，〈齊梁之變：成都南朝紀年造像風格與範式源流〉，《考古學報》，2018年3期，頁313-331。
-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顏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 魏文斌、吳葦，〈涇川大雲寺遺址新出土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5期，頁74-91。
- 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国の石仏——莊嚴なる祈り》，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1995。

-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
- 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 町田市立博物館，《浜松市美術館所蔵小杉惣市コレクション中国の金銅仏・石仏》，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1994。
- 東山健吾，〈麦積山石窟の草創と仏像の流れ〉，收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協会、日本經濟新聞社，《中国麦積山石窟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2，頁 14-24。
- 松本榮一，《燉煌画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学院東京研究所，1937。
-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 秋山光夫，〈北魏像碑の維摩變相圖に就いて〉，《考古學雜誌》，26 卷 10 號，1936 年 10 月，頁 595-611。
- 漆紅，〈立体『維摩詰經』としての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維摩詰經』造像研究—〉，《佛教藝術》，326 號，2013 年 1 月，頁 9-41。
- 藤枝晃，〈維摩變の系譜〉，《東方學報（京都）》，36 冊，1964 年 10 月，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 287-303。
- Bunker, Emma C. "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īrti." *Artibus Asiae* vol. 30, no. 1 (1968): 28-52.
- Heyman, Larua Gardner. "The Meeting of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Chinese Innovation in Buddhist Iconograph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
- Leidy, Denise Patry. "The Issue of the Trubner Stele." I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ited by Denise Patry Leidy and Donna Strahan, 189-197.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10.
- Priest, Alan.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reprint.
- Sirén, Osvald.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8 reprint.

圖版出處

- 圖 1 蕭梁，背屏式佛造像背面，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圖版取自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圖版 58-3。
- 圖 2 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右，維摩詰與侍者之像，甘肅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第 11 號壁畫，局部。作者攝。
- 圖 3 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右，坐佛三尊殘像，甘肅永靖炳靈寺第 169 窟第 10 號壁畫。作者攝。
- 圖 4 北魏延興三年（473），劉琛造多寶佛立像背面拓片，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藏。作者攝。
- 圖 5-1 北魏太和元年（477），釋迦牟尼佛坐像背光背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2 北魏太和元年（477），釋迦牟尼佛坐像背光背面，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1 北魏中期，維摩詰坐像，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7 窟主室，南壁第一層東龕。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冊 4，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圖 113。
- 圖 6-2 北魏中期，文殊菩薩坐像，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7 窟主室，南壁第一層西龕。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冊 4，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圖 123。
- 圖 7 北魏中期，維摩詰經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1 窟，南壁東側。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冊 1，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圖 9。
- 圖 8 北魏中期，維摩詰經像，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6 窟，南壁中層中部。圖版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圖 111。
- 圖 9 北魏普泰元年（531），蘇進達等邑義造像碑，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山口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彫刻》，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13，圖 20。
- 圖 10-1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上層第三大龕，局部。圖版取自劉景龍，《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圖 106。
- 圖 10-2 北魏晚期，文殊菩薩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上層第三大龕，局部。圖版取自劉景龍，《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圖 107。
- 圖 11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上層第一大龕，局部。圖版取自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 158。

- 圖 12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第 188 龕，局部。圖版取自劉景龍，《古陽洞——龍門石窟第 1443 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圖 166。
- 圖 13-1 北魏永平四年（511），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中層第三大龕，局部。圖版取自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 166。
- 圖 13-2 北魏永平四年（511），文殊菩薩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中層第三大龕，局部。圖版取自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 168。
- 圖 14-1 北魏晚期，東壁線描圖，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本文篇》，京都：同朋社，1980，圖 18、圖 19。
- 圖 14-2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原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南側上層，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藏。作者攝。
- 圖 14-3 北魏晚期，文殊菩薩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北側上層。作者攝。
- 圖 14-4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東壁南側上層。作者攝。
- 圖 15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變，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蓮花洞，南壁第 41 龕，局部。圖版取自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 56。
- 圖 16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彌勒洞北二洞，北壁，局部。圖版取自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 68。
- 圖 17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像，河南鞏義市鞏縣石窟第 1 窟，東壁第 1 龕。作者攝。
- 圖 18 北魏孝昌三年（527），蔣伯仙造像碑碑陰，局部，原在河南延津蔣村區清寺，原石舊藏巴黎。圖版取自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8 reprint, vol. 1, pl. 153.
- 圖 19 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愔等造立佛三尊像碑陰拓片，局部，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圖版取自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ed.,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4, cat. 32, p. 91.
- 圖 20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像，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35-1 窟，西壁下層。圖版取自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圖 208。
- 圖 21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像，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5-36 窟，西壁。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冊 2，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圖 83。
- 圖 22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14 窟，西壁下層右側龕內。圖版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冊 11，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51-1956，圖 13b。

- 圖 23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32-10 窟，外壁上部西側。作者攝。
- 圖 24 北魏晚期，維摩詰坐像，山西沁縣南涅水出土，山西博物院藏。作者攝。
- 圖 25 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碑陰，局部，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26 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碑，局部，山西大同北魏藝術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27 北魏晚期，交腳彌勒菩薩造像碑，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圖版取自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韻——西安碑林造像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19。
- 圖 28 北魏晚期，佛教造像碑，陝西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公社東席村出土，陝西西安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孫福喜主編，《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10，圖 38。
- 圖 29 北魏晚期，維摩詰經像，甘肅華亭石拱寺石窟第 11 窟，入口上方。作者攝。
- 圖 30 北魏晚期，第 10 號佛教造像碑，局部，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33 窟。作者攝。
- 圖 31 東魏武定元年（543），李道贊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局部，原在河南淇縣浮山崇封寺，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32-1 東魏，文殊菩薩坐像，原在山西天龍山第 3 窟西壁龕龕外南側，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32-2 東魏，維摩詰坐像，原在山西天龍山第 3 窟東壁龕龕外南側，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山口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彫刻》，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13，圖 32。
- 圖 33 西魏，佛教造像碑，局部，傳原在山西芮縣，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34 西魏恭帝元年（554），薛山俱二百人造像碑，局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作者攝。
- 圖 35 西魏大統三年（537），比丘法和造像碑，陝西西安未央區出土，陝西西安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孫福喜主編，《西安文物精華——佛教造像》，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10，圖錄 40。
- 圖 36-1 西魏，釋迦牟尼佛三尊像，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23 窟，正壁。圖版取自天水麥積山石窟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35。
- 圖 36-2 西魏，文殊菩薩三尊像，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23 窟，右壁。圖版取自天水麥積山石窟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36。
- 圖 36-3 西魏，維摩詰三尊像，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23 窟，左壁。圖版取自天水麥積山石窟研究所編，《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 137。

- 圖 37 西魏，維摩詰經變線描圖，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27 窟，東壁。圖版取自鄭炳林、沙武田，〈麥積山第 127 窟爲乙弗皇后功德窟試論〉，《考古與文物》，2006 年 4 期，圖 4。
- 圖 38 東魏武定年間（543-550），佛教造像碑，局部，山東東平出土，山東泰安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李靜杰，《石佛選萃》，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圖 23。
- 圖 39 北齊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5），維摩詰經變，局部，河南安陽小南海石窟中洞，入口上方。作者攝。
- 圖 40 北齊天保二年（551），坐佛九尊像造像碑，局部，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41 北齊天保十年（559），高海亮等造佛碑像，局部，河南襄城孫莊出土，河南博物院藏。圖版取自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9，頁 218。
- 圖 42 北齊，四面造像碑，局部，河南洛陽徵集，河南洛陽古代藝術館藏。作者攝。
- 圖 43 北齊河清三年（564），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碑，局部，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藏。圖版取自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編》，冊 2，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 433。
- 圖 44 北齊天統三至五年（567-569），崔永仙等造像碑，局部，原在河南偃師南蔡莊鄉寺里碑村平等寺，河南偃師商城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北齊北周造像，圖錄 18，頁 257。
- 圖 45 北周保定二年（562），衛秦王等造像碑，局部，山西運城解州鎮徵集，山西博物院藏。作者攝。
- 圖 46 北齊武平六年（575），佛教造像碑，局部，原在山西太原天龍山，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47 北周天和三年（568），佛教造像碑，局部，陝西長武出土，陝西長武縣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48 北周武成二年（560），張代李石造像碑，局部，甘肅涇川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項一峰，〈6 世紀前《維摩詰經》變相再探討——以涇渭河流域造像爲例〉，《石窟寺研究》，10 輯，2020 年 6 月，圖 13。
- 圖 49 北周庚辰年（560），比丘法起造像碑，局部，甘肅涇川大雲寺遺址出土，甘肅涇川縣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魏文斌、吳葦，〈涇川大雲寺遺址新出土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 5 期，圖 4。
- 圖 50 北周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局部，甘肅秦安新化鄉任吳村徵集，甘肅省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51 北齊，佛教造像碑，原在山東博興興益村，山東博興縣博物館藏。陳思遙攝。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Lee, Yu-m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fourth to the sixth century, the belief in Vimalakīrti achieved immense popularity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were diverse in these two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sūtra, Vimalakīrti, a layman of Vaiśālī, was a brilliant debater; thus, in the South, *chingtan* literati of the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onsidered him as a role model. The portrait of Vimalakīrti as a layman in a Chinese robe was more popular in the Sout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the North usually present Vimalakīrti and Mañjuśrī as a pair, and early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īrti either show him as a Bodhisattva or a layman in “barbarian” dress. Evidently, earl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the North diverged from those in the South. After the Northern Wei moved its capital to Luoyang in 494, the Northern Wei vigorously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Sinic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Vimalakīrti in the North began to be portrayed as a slender layman, wearing a Chinese scholar’s robe and sitting in a relaxed posture leaning on a stand in front or a pillow at the back.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epiction of Vimalakīrti and Mañjuśrī seated on either side of a niche or a Buddha was the most commonly seen and became widespread. In addi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with narrative elements were found in Honan, Shanxi and eastern Gansu; however, the details of these works varied.

Keywords: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Vimalakīrti, Mañjuśrī,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圖 1 蕭梁 背屏式佛造像背面 四川成都西安路出土 四川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 2 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右 維摩詰與侍者之像 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第11號壁畫 局部



圖 3 西秦建弘元年(420)左右 坐佛三尊殘像 甘肅永靖炳靈寺第169窟第10號壁畫



圖 4 北魏延興三年(473) 劉琛造多寶佛立像背面拓片 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藏



圖 5-1 北魏大和元年(477) 釋迦牟尼佛坐像背光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2 北魏大和元年(477) 釋迦牟尼佛坐像背光背面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北魏中期 維摩詰坐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窟主室 南壁第一層東龕



圖 6-2 北魏中期 文殊菩薩坐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窟主室 南壁第一層西龕



圖 7 北魏中期 維摩詰經變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1 窟 南壁東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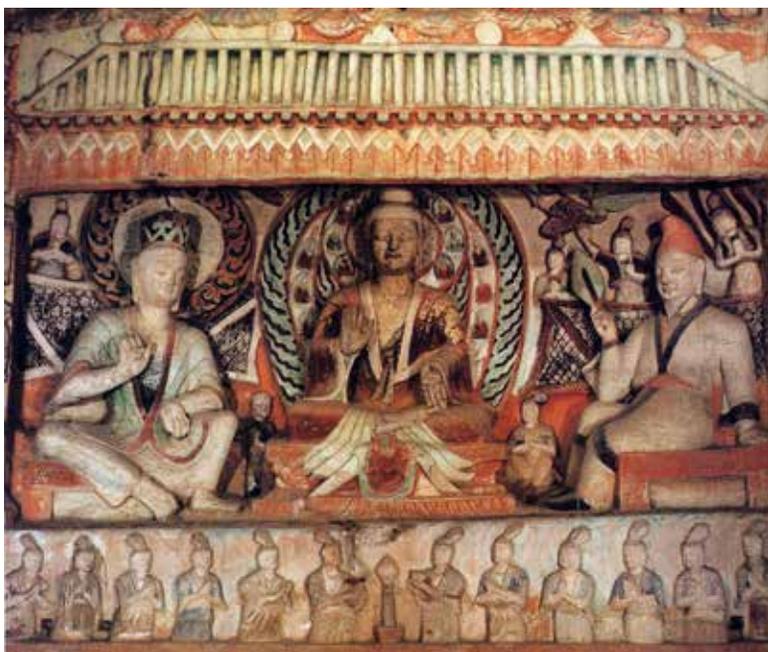


圖 8 北魏中期 維摩詰經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6 窟 南壁中層中部



圖9 北魏普泰元年(531) 蘇進達等邑義造像碑 局部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圖 10-1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上層第三大龕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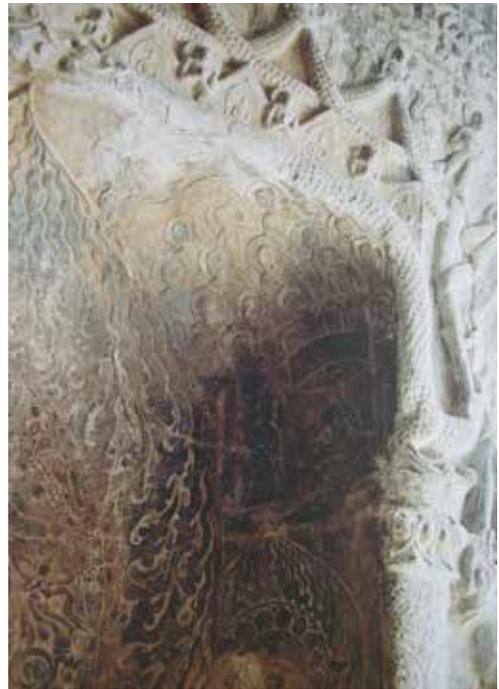


圖 10-2 北魏晚期 文殊菩薩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上層第三大龕局部



圖 11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上層第一大龕 局部



圖 12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第 188 龕 局部



圖 13-1 北魏永平四年(511)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中層第三大龕 局部



圖 13-2 北魏永平四年(511) 文殊菩薩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 北壁中層第三大龕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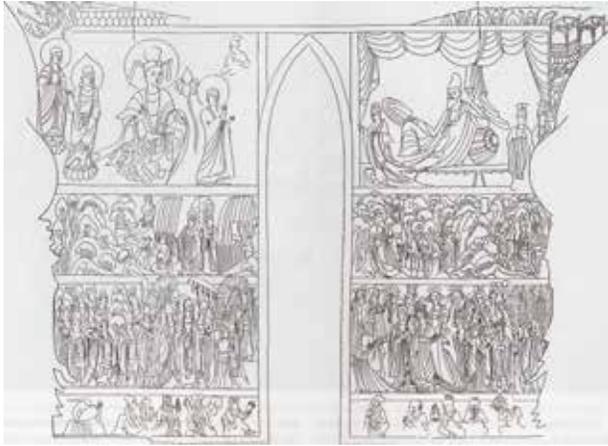


圖 14-1 北魏晚期 東壁線描圖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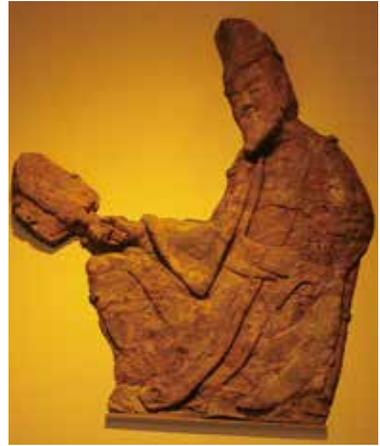


圖 14-2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原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東壁南側上層 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藏



圖 14-3 北魏晚期 文殊菩薩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東壁北側上層



圖 14-4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 東壁南側上層



圖 15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變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蓮花洞 南壁第 41 龕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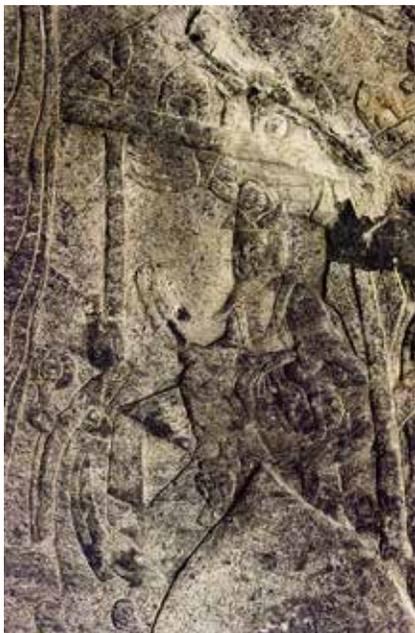


圖 16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彌勒洞北二洞 北壁局部



圖 17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像 河南鞏義市鞏縣石窟第 1 窟 東壁第 1 龕



圖 18 北魏孝昌三年（527） 蔣伯仙造像碑碑陰 局部 原在河南延津蔣村區清寺 原石舊藏巴黎



圖 19 北魏永熙二年（533）趙見喜等造立佛三尊像碑陰拓片局部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圖 20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35-1 窟 西壁下層



圖 21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5-36 窟 西壁



圖 22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變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14 窟 西壁下層右側龕內



圖 23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變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32-10 窟 外壁上部西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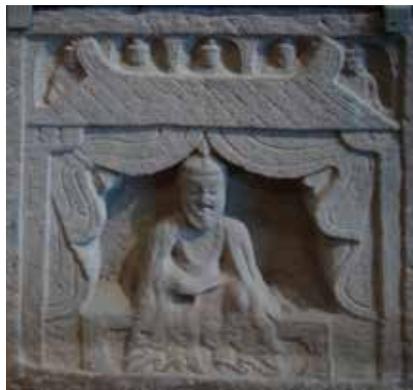


圖 24 北魏晚期 維摩詰坐像 山西沁縣南涅水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圖 25 北魏神龜三年（520）李僧智王阿金等造像碑碑陰 局部 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 26 北魏晚期 佛教造像碑 局部 山西大同北魏藝術博物館藏



圖 27 北魏晚期 交脚彌勒菩薩造像碑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 28 北魏晚期 佛教造像碑 陝西西安市未央區
六村堡公社東席村出土 陝西西安博物院藏



圖 29 北魏晚期 維摩詰經像 甘肅華亭石拱
寺石窟第 11 窟 入口上方



圖 30 北魏晚期 第 10 號佛教造像碑 局部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33 窟



圖 31 東魏武定元年(543) 李道贊等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 局部 原在河南淇縣浮山崇封寺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 32-1 東魏 文殊菩薩坐像 原在山西天龍山第3窟西壁龕龕外南側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藏



圖 32-2 東魏 維摩詰坐像 原在山西天龍山第3窟東壁龕龕外南側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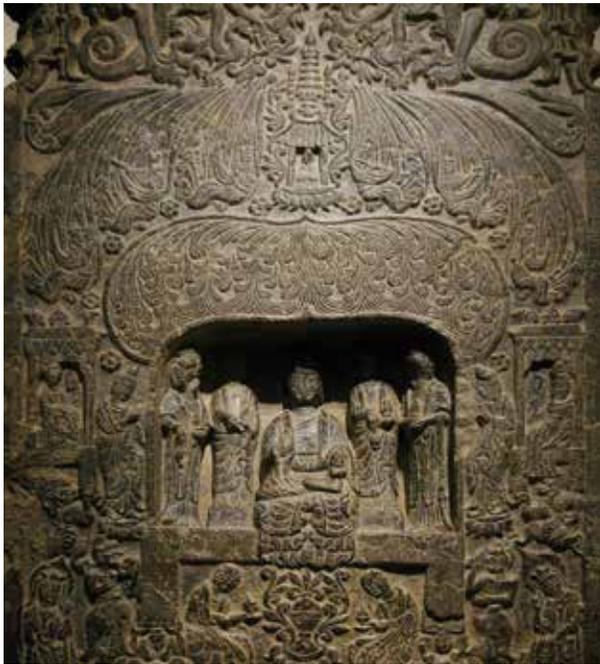


圖 33 西魏 佛教造像碑 局部 傳原在山西芮縣
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圖 35 西魏大統三年（537）比丘
法和造像碑 陝西西安市未央
區出土 陝西西安博物院藏



圖 34 西魏恭帝元年（554）薛山俱二百人造像碑 局部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36-1 西魏 釋迦牟尼佛三尊像 甘肅天水麥積石窟第 123 窟 正壁



圖 36-2 西魏 文殊菩薩三尊像 甘肅天水麥積石窟第 123 窟 右壁



圖 36-3 西魏 維摩詰三尊像 甘肅天水麥積石窟第 123 窟 左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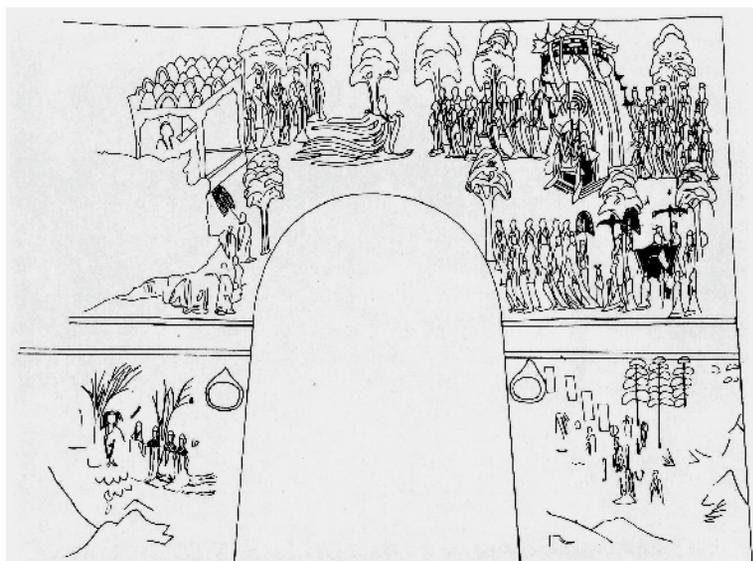


圖 37 西魏 維摩詰經變線描圖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第 127 窟 東壁



圖 38 東魏武定年間(543-550) 佛教造像碑 局部 山東東平出土 山東泰安博物館藏



圖 39 北齊天保元年至六年(550-555) 維摩詰經變 局部 河南安陽小南海石窟中洞 入口上方



圖 40 北齊天保二年(551) 坐佛九尊像造像碑 局部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



圖 41 北齊天保十年(559) 高海亮等造佛碑像 局部 河南襄城孫莊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圖 42 北齊 四面造像碑 局部 河南洛陽徵集
河南洛陽古代藝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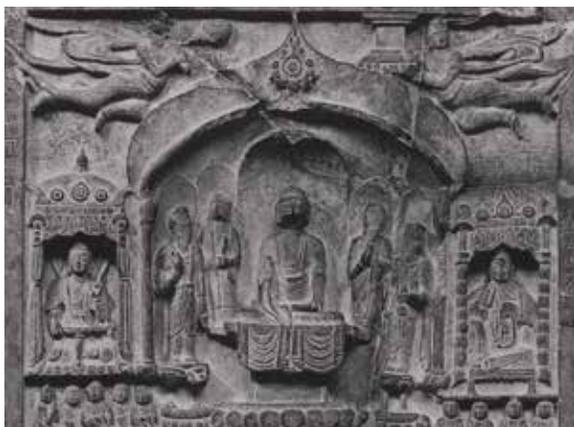


圖 43 北齊河清三年（564）比丘道政四十人等造像
碑 局部 美國華盛頓特區弗利爾與賽克勒美
術館藏



圖 44 北齊天統三至五年（567-569）崔永仙等造像碑
局部 原在河南偃師南蔡莊鄉寺里碑村平等寺
河南偃師商城博物館藏



圖 45 北周保定二年（562）衛秦王等造像碑局部 山西運城解州鎮徵集 山西博物院藏



圖 46 北齊武平六年（575）佛教造像碑局部 原在山西太原天龍山 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藏



圖 47 北周天和三年（568）佛教造像碑局部 陝西長武出土 陝西長武縣博物館藏



圖 48 北周武成二年（560）張代李石造像碑 局部 甘肅涇川博物館藏



圖 49 北周庚辰年（560）比丘法起造像碑 局部 甘肅涇川大雲寺遺址出土 甘肅涇川縣博物館藏



圖 50 北周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 局部 甘肅秦安新化鄉任吳村徵集 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 51 北齊 佛教造像碑 原在山東博興興益村 山東博興縣博物館藏